

編者的話

我們的青年同志生長在新社會，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封建地主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對舊思想影響的抵抗力也比較弱。我們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是怎樣進行鬥爭和反抗的，特地編輯出版這本書，供大家閱讀。我們希望青年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後，對新舊社會從本質上認真地做一番比較。這將會激發我們的革命熱情，使我們更加熱愛社會主義，更加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懂得怎樣繼承前輩的革命事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為爭取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而英勇鬥爭！

1963年4月

目 次

血泪斑斑的罪証.....	任楚材 王少华	3
——在地主庄园陈列館里看到的		
五斗租子和三条人命.....	邓繼明	11
閻王債.....	黄朝天	16
三笔血債.....	王小山	24
一块門板.....	白 华	35
越逃越荒.....	朱振昌	39
“白眼窩”.....	刘益民	45
“大鯊魚”.....	勵承国 高金德 施均济	51
苦难的二十八年.....	宁松勛	59
一包痂疤的来历.....	于德江	66
血泪深仇.....	唐海清	73
美国强盜的一桩罪行.....	袁陆先	78

血泪斑斑的罪証

——在地主庄园陈列館里看到的

任楚材 王少华

最近，我們到四川大邑县安仁公社，参观了一座地主庄园的陈列館。那里面陈列着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采压迫和剝削农民的許多罪証。看了这些血泪斑斑的罪証，激起了我們无比的憤慨。

“四方土地都姓刘，顆顆血泪为他流”

我們在刘文采家的一本厚厚的佃戶花名册中看到，仅仅他一家，就占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整个大邑县三十多万人，总共有土地五十多万亩，光是姓刘的一族十四戶地主，就占地三十多万亩。少数人占有大量土地，大多数农民只好佃田耕种，向地主交租納稅，这就造成了地主对农民的剝削。

刘文采原先只是一个做投机生意的小地主，田地也不多。后来，他依仗族中軍閥势力，做了川南稅捐总局的“总办”，不久又升任为“叙南清乡司令”。他利用职权，貪污、販毒、敲詐勒索、明征暗搶，搜刮了人民八百多万銀元。1935年，他的靠

山軍閥敗退轉移，他便在武裝護送下帶着二十幾船金銀財寶，溜回安仁老家，大肆買田置地，修建莊園，當起“土皇帝”來。

農民劉益山，是劉文采的近鄰。他家有一套四合頭的院房，六畝水田，周圍青竹環繞。劉益山才七歲就死去了父親。母親守着這塊土地，一把眼淚一把汗，把孩子拉扯大。劉文采為了擴建莊園，早就想奪這塊肥肉。他先要強買這塊地，劉益山母子不肯賣。劉文采和他的幾個狗腿子，便定下了毒計：假意介紹劉益山的弟弟出去當“官”，半路上殺掉了他，回頭來再誣告劉益山通匪。這樣，逼得劉益山連夜逃跑。

劉益山離了家，劉文采再來逼他母親。這幾畝田產是全家的命根子，橫說豎說她還是不肯賣給地主。劉文采一不做二不休，竟叫人開了條大水溝，放水直朝劉益山的房子沖，牆沖垮了，水直流到床下，劉益山的母親嚙不下這口氣，一頭栽下床。臨死時，口里還不斷喊着：“兒呀，你要報仇啊！”

劉益山接到妻子的信，冒死趕回來埋葬了母親。那時，正值插秧季節，劉益山看見別人的田都綠了，自己的田還荒着，便去請人幫忙。近鄰聽說是“總辦”看中的田，誰也不敢來。劉益山只得到遠處請來三個表兄弟，幫助翻地插秧。

一天中午，劉益山上場去買菜，還沒進場口，就聽見幾聲槍響，他心驚肉跳，急忙趕回來，果然出了意想不到的事：三個表兄弟被劉文采的狗腿子打死在田中。劉益山剛剛走近，話還沒說出一句，幾個狗腿子跳出來，一陣繩捆索綁，就把他拖進鄉公所，安上“勾結土匪”的罪名下了監。

劉益山的妻子哭的死去活來，心想，守着這田產也是死，

救人要紧。連忙托人說情，磕頭陪罪，把房屋田产一齐送給刘文采，才救了丈夫的命。

刘益山怀着血海深仇，悄悄裹上三个表兄弟的血衣，离开了祖祖輩輩血汗泡过的田地，飄流外乡。

这只是刘文采霸占田产的一件小事。据統計，单是他修建庄园，就害得三十几家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此以外，他霸占田地的险毒手段，还有什么“买飞田”、“吃心心”等二十几种。例如刘文采看中了那块田，就指使一个地痞冒充业主出面卖田，真业主惹不起刘家，只得忍气吞声。这就叫“买飞田”。王泗乡有个孟大娘赶場回家，自己的五亩四分田被刘家买了“飞田”，活活气死了。那家坚决不卖的，刘家就将周围的田买下，不放堰水，逼使低价出卖，这就叫“吃心心”。刘文采还在安仁鎮開設了烟館、賭場、当鋪和錢庄等七十多家，盘剝劳动人民。錢庄的“滾滾利”、“砍头利”、“場場利”，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傾家蕩产，失去土地。



刘文采吸吮农民的血汗得来的家产，連他自己也数不清。有人替他作过統計，他除了占有一万二千多亩田地外，还修有二十五处公館，一千五百余間街房。安仁場上七条街，他就占去整整四条。此外，还有五間当鋪、十二处錢庄、十座碾磨房、二十七座倉庫，散布在十几个县。每到秋天，农民肩挑車推，含着眼泪，把一年血汗换来的果实送进刘家的倉庫，自己却去挖野菜充飢。当时，农民流传着两句血泪的歌謠：“四方土地都姓刘，顆顆血泪为他流。”

一千张状子，抵不上“活閻王”一句話

看了上面这些材料，你們也許会气愤地問：“刘文采这么横行霸道，难道沒有政府管，沒有法律制裁嗎？”

有的。但那时的政府管的是劳动人民，法律也是专门制裁劳动人民的。刘文采有几种臉譜：在反动政界，他是川南稅捐总局的“总办”；穿起軍服，是“清乡司令”；在茶楼，則是“公益协进社”的总舵把子。他的魔爪上通官府，下通各地的地头蛇。大邑县各乡的乡长、保长都是他的“兄弟伙”。川西的大土匪头子郭保芝，是他的干儿子。土匪进行搶劫的枪枝，都是他供应的；搶劫来的财产他就坐地分赃。刘文采本身就是地主、軍閥、官僚、土匪四位一体的代表，仗着这帮狐群狗党，称霸一方。不管哪一屆县长上任，都得亲身前去刘家送礼，稍有言語不周，手足不到，县太爷的宝座就会坐不稳。刘文采强占田地房屋，摊派民工为他修戏院、花园时，农民起来反抗，伪县长还赶紧带兵前来鎮压，并且正式貼出告示：只准听从，不准反抗；

誰要反抗，不問情由，先綁起丟監再說。有個叫黃治安的農民，揭露了劉文采的錢莊“白天借出錢，黑夜搶回來”的強盜行為，第二天就被打死示眾。他的家屬抱尸痛哭，想去告狀。劉文采的狗腿子，却兩手掙腰，鼻子里哼出兩句話來：“你一千張狀子，抵不上‘總辦’一句話。”

這就是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官僚、軍閥、地主結成一伙，掠奪農民的土地、財產，殘害農民的性命。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建立起的政府，制訂出的法律，都是為官僚、地主的利益服務的，是他們剝削農民的工具。劉文采為了要農民服服貼貼地任他宰割，還私設刑堂和各種迫害農民的刑具，如專門毒打農民的扁担、彈簧鋼鞭，腳鐐，手銬，老虎凳……。在離他家後門不遠的地方，還有一間神不知、鬼不曉的水牢。現任大邑縣唐場公社黨委副書記冷月英同志，就是從這間水牢里僥倖活出來的人。

1937年，天旱歉收，冷月英“欠”了劉文采五斗二升租谷，剛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丟進水牢。黑魃魃的水牢



里，臭气熏得人噁心，齐腰深的水，冰透了骨头。刚生了孩子的人，身上血水还未干，被冷水一渍，肚子痛得像刀绞。冷月英摸着走了几步，一脚踏在死人背脊上，一脚又踩着死人脑壳。狗腿子这时用木棒把冷月英戳进水中間的一个铁籠里，冷月英一下昏死了过去。醒来时，她借着个小洞透进的光亮，才看清水里满是尸骨，铁籠外边还泡着三个农民兄弟。

整整泡了七天，冷月英的男人赶回家来，忍着高利贷的盘剝，借来二十块銀元，到处托人情，才把人“贖”了出来。这时，冷月英只剩下一口气了。狼心狗肺的刘文采，竟还向冷月英要“房”錢，关了七天水牢，一天一斗米，硬敲榨去七斗米。

在刘文采这所阴森森的大庄园里，折磨死的农民兄弟是数不清的。他的大儿子刘元龙外出打猎，有时兽性发作，竟把农民当靶子射击。他把农民的命看得比狗都不如。有一回，刘家的一只恶狗咬伤了农民罗洪发，罗洪发打了狗几竹竿，后来狗得病死了，刘家硬逼着罗洪发卖去田地，披麻戴孝，跪在狗灵牌面前，給狗做了三天道場。这一带的农民，都管这个喝人血、吃人肉的刘文采叫“活閻王”，管这座血淋淋的庄园叫“活地獄”。

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

刘文采住在用劳动人民血肉建造的“宮殿”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他的庄园里，接待官僚、政客，有西式客厅；接待匪首、袍哥头子，有中式客厅；抽大烟，設有四季吸烟室。他娶有三妻

四妾不滿足，还專門修建了供他宣淫玩乐的“逍遙宮”，“歡喜樓”。据他的一个管事供称，被他奸污过的妇女就有五六百人。这座庄园，密密麻麻的房子总共有一百八十多間。

这么多房子，刘文采一家究竟有多少人呢？六个。服侍这六个人的，却有一百多人。什么总管家、管事、保鏢、轎夫、奶媽、丫头等一大串。出門不是坐轎子，就是小臥車，前呼后拥，队伍扯起半里路长。

刘文采穷奢极欲，他一个人的四季衣服就有三四百件。床上的一籠珍珠罗紋帳，四两重，捏在手里，只有一把。他最宠的第五个小老婆，为了吃鴨脚上的那点点蹼，一頓飯就得杀三十几只鴨子。刘文采日嫖夜賭，又生怕短命，頓頓山珍海味、人参燕窝还嫌不滋补，專門找七个奶媽，天天挤奶喂他。这还不算，又强迫許多青年农民抽血，注进他的身上。……

农民們被刘文采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反抗。在共产党地下組織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們扛起鋤头，高举梭鏢、扁担，破仓分粮，直闖“公堂”，打死了伪县长徐元勛。平日狐假虎威的狗腿子連忙向农民跪地求饒。斗争的风暴吓得刘文采丧魂落魄，他夹着尾巴連夜逃往成都，半路上挨了农民一枪，到成都就一命嗚呼了。

解放后，安仁乡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清算了这个大地主、大恶霸，土地改革后，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此，安仁乡的劳动人民才永远摆脱了被压迫被剝削的痛苦生活，朝气蓬勃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刘氏家族的庄园，早已成为人民的财产。有的做了拖拉机站，有的办了公社的敬老院、幼儿园。

天真活泼的孩子，在阳光撫照下做游戏，唱着“东方紅，太阳升”“人民公社一支花”的歌曲。……

別忘了什么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压迫

解放前的安仁乡，何尝不是旧中国农村的一幅縮影？解放前孟大娘、刘益山、冷月英这些农民的遭遇，何尝不是几亿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遭遇？現在，人民政府用“活閻王”的罪恶事实和他的“活地獄”，成立了一所展覽館，用它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記过去！

五斗租子和三条人命

邓 繼 明

解放前，我家欠了财主五斗租子，被他杀害了三条人命，真是一桩永世难忘的仇恨！解放后，奶奶时常对我讲这桩事，每讲一次，她都要哭一起。我听了，也随着她哭。爹听了，劝她说：“这是什么年月了？快别讲那些寒心伤气的事了。”奶奶说：“日子过得越好，越应该讲讲过去。”她还是经常讲，生怕我忘了——谁是亲人，谁是仇人。

我家住在湖南省邵阳县东田村。我有两个姑母和两个叔父。大姑满十七岁的那年，是个大荒年。秋天，地上的草都被吃光了，到处是光秃秃的。地上躺着饿死的穷人。我家头年租了财主郑顺几亩地，连秸草都给了他，还欠下五斗租子。眼看着这年寸草未收，头年欠下的五斗租子，连本带利，翻成了一石。转眼间，到了腊月二十九，财主又打发他儿子郑小虎来逼租，把爷爷逼得死去活来。奶奶杀了两只母鸡和一只鹅，请他肥吃肥喝了一顿，才答应第二年秋还他两石粮了事。

郑小虎走后，奶奶和姑姑还没拾掇好碗筷，财主自己又领着几个狗腿子闯进了门。我家里的人吓得挤在一堆，谁也不

敢吭声。财主在屋子里摆来摆去，两只眼贼溜溜地转了好久才开口说：“你们这些穷鬼红口白牙，说啥算啥？欠下我的租，说来年还就来年还？我信得过你们吗？”

爷爷陪着小心说：“就靠财主恩典了！”

“不行！今天是大年，帐不过夜，”财主一蹦多高地呵斥着，“有粮，马上还清一石租子；没粮，来年要还两石，可是得叫树姐到我家去作押。”

树姐是大姑母的名字。奶奶听说叫大姑去顶押租，忙对财主说：“她过了年才十八岁，女孩子，不懂事，又正闹病，做不了什么活。财主要是信不过，就叫二舅去吧。”

二舅是我的二叔父，比大姑小四岁。奶奶怕把大姑送进火坑，狠着心答应叫他去。其实财主早就打上了大姑的主意，任凭全家苦苦哀求，还是一口八个不行。他见祖父和父亲动手拦阻，劈头就是一顿毒打，又命狗腿子用枪逼住他们，到底把大姑抢走了。

第二年，为了争个好收成，好把大姑赎回来，爷爷带上全家人，起早贪晚下地劳动。哪知刚插完稻秧，爷爷和叔父就累得病倒了。大姑被财主抢去后，一直没有音信。奶奶愁得整夜睡不着觉，一闩上眼就哭喊起来，口口声声叫大姑。

割麦子的时候，突然财主家的狗腿子通知爷爷说，大姑吃东西中毒死了。起初大家都瞒着奶奶。后来被她知道了，哭喊着跑到财主家去，要看大姑的尸首。财主说尸首埋进了他的祖坟，不准动！还把奶奶打了两棍子，指着她的鼻子说：“以后再为这件事胡缠，就打死你！”

奶奶被乡亲从財主家救回来，一病就躺了三个月。我家里的人，誰也不信大姑是吃东西毒死的，更不信財主会把她埋进祖坟。但是，爷爷却不許大家講，怕再招来祸害。

秋天，我家刚开始割庄稼，財主就打发狗腿子来催租。爷爷和爹把粮全給財主背进了仓，才勉强还上了当年的租子。家里一粒粮食也沒有了。人饿肚子不打紧，还不上財主的两石租子債却是大事。全家人見爷爷急得团团轉，就分头出去拾庄稼。

那年是个坏年景，地里拾粮的穷人很多。二姑出去轉了两天，只拾回半碗粮。第三天出去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来。全家人急得像火上了房似的，出去找了半宿，連个影子也沒找到。爷爷和爹都說二姑是饿死了，也許是叫野兽吃了。奶奶却不信，每天黄昏都跑到村外去，边哭边喊叫二姑。

从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五，奶奶整整哭喊了一个月。最后一天，她真把二姑喊回来了。但是，二姑已經变得不像人样了。头发蓬乱着，脸上沒有血色，瘦得皮包骨头，衣服也破得遮不住身子了。

原来二姑是从財主家逃回来的。財主見二姑出去拾了两天庄稼，就打上了坏主意。第三天下午，派狗腿子把她抓去，硬逼着她做小老婆。二姑当然不答应，財主一頓毒打之后，又把她关进碾房里，不給飯吃，还叫她推磨推碾子。沒过几天，二姑就被折磨得病倒了。我家的邻居长福叔，是財主家看門的长工。前两天，他到磨房送粮遇到了二姑，才設法把她放出来。

二姑回来，还說出了大姑的下落。原来財主把大姑搶去以后，也是逼她做小老婆。大姑不肯，財主把她折磨得半死，又用石头把她軋进泥塘，活活淹死了。

全家人听說大姑是被財主害死的，又見二姑被折磨得不像个人，都围着二姑哭起来。奶奶紧紧摟住二姑說：“我們死也要全家死在一起！”但是，当天晚上，二姑又被財主家的狗腿子搶走了。第二天中午，长福叔來說，二姑被財主抓回去就打死了，尸首已經埋进烂坟堆。这真是旧恨沒平，新仇又起。奶奶气得昏了过去，爷爷要去告状，爹摸起斧子要去报仇，邻居們也气得破口大罵，但又怕惹不起財主，他們把爷爷和爹紧紧拉住不放。

財主郑順有錢又有勢。还在好多年以前，这方圓六十里的田地，只有一亩不是他家的。保长、甲长都是他指名安排的。有一年，他要买那一家穷人的这亩田，为了炫耀財势，把銀花餅（銀洋）摆得和田埂一般高。可是那家穷人硬是不卖。他就用抓兵、派捐、出伏等等办法，把人家害得家破人亡，到底把那亩田霸去了。从那以后，他更成了方圓六十里內的閻王爷，杀人害命，搶男霸女，胡作非为。穷人們恨他恨得入骨，可是惹不起他。在邻居們的劝說下，爷爷和爹只得把这口怨气吞下肚里去。

財主害死一个穷人并不算回事，穷人欠他的粮少一粒也不行。快到中秋节时，他見我家还没还他的两石租子，就叫女儿小破鞋来坐帐。小破鞋和二姑一般大，也是十七岁，长得却像个母夜叉。她一进我家門，就扯动滿脸橫肉开口罵人，我家

里的人誰也不敢理她。爷爷和奶奶急得像热鍋上的螞蚁，整天用好飯好菜招待她。給她做魚吃，她嫌刺多；做鷄吃，她嫌鷄不肥，骨头多，不是摔碗，就是砸鍋，把我家鬧得天昏地暗。爷爷苦苦央求了三天三夜，答应重阳节还清租子，才送走这个瘟神。

話好說，事情难办。从中秋到重阳节日，还不到一个月時間，哪里去弄两石粮呢？爷爷东奔西走跑了五、六天，还是沒想到办法。一天晚上，爷爷刚从外边回来，长福叔跑来送信說，小破鞋从我家回去就生了病，已經病死了。財主說，是来我家坐帳被爷爷毒死的，要抓爷爷去垫棺材（殉葬）。

真是褲子沒补又烧了袄。为了保住活命，家里只留下奶奶和二叔，其余的人都逃进山里。那天晚上，財主派狗腿子到我家抓人，見只有两个人在，便把二叔綁走了。

財主家天井里搭了座灵堂。小破鞋的棺材，整整停放了六天。二叔被財主关在空仓子里，六天来水飯未沾唇，已經餓得昏迷不醒。眼看再过一天就要下葬，还是长福叔，乘夜間把二叔救出来。

二叔逃回家里，連夜又同奶奶逃往深山。但是，他已被財主折磨得半死不活，走到半路就死去了。

（陈兵赤整理）

閻王債

黃朝天

1926年，我滿了十歲。夏天，母親把我從外婆家接到興國江背洞大水坑老家。

這年，母親還不滿四十歲，就被苦難的生活折磨得鬢髮斑白，左眼失明了。

每天，天還沒亮透，她就披上破大褂，悄悄地上山了。回來時，担着比她還高的一担柴，成天地忙碌着。可是，家里還是少吃缺穿。我不明白，我家為什麼會這樣窮？母親為什麼會這樣苦？有一天，我纏住母親，要問個究竟，她終於開口了。

“囡子，”她直楞楞地看着我，好久才說：“生下你一個月，你父親就病死了，拋下孤兒寡母，拉下了一筆閻王債，……為了還這筆債，媽十年來起早搭黑地砍柴賣柴，好容易積攢了幾個錢，連交給地主家的利息還不夠。唉，地主逼債逼得緊呀……”說着就掉下淚來。

“什麼債？”我急問。

“你還不懂事，說也沒有用啊。”母親撩起衣襟揩掉淚水，“幫媽干活吧！囡子。”

我怕母亲伤心，沒有再問下去。打这以后，我就天天跟着母亲上山砍柴。

柴砍下来，晒好，再挑到江背洞或桥头去卖。

每回，我們卖得十二、三个銅板，母亲总是舍不得花，除在集鎮上称回几斤紅薯或南瓜当

口粮外，剩下的銅板，就一个一个放进了小瓦罐里。碰到刮大风，下大雨，上不了山，或木柴卖不出去，母亲便去摘些紅薯叶，掺些紅薯煮一煮，讓我吃紅薯，自己吃叶子。有时断炊了，她宁肯餓肚子，也不花瓦罐里的銅板。好几次，我生母亲的气。我說：

“阿媽，把存的錢花了吧，你怎么这样舍不得？”

“錢是人家的！”阿媽总是这样說，“囤子，眼看着就到九月重阳，要債的人又要上門啦！媽怎么敢花一个銅板！”

又是那笔閻王債。一提到这笔債，母亲就担惊受怕，眉头紧皺，唉声叹气。这一天，我又向母亲追問这笔債的来由。

原来，十年前的九月重阳节，父亲因长年劳累，重病去世了。那时，母亲手边沒有一文錢，逼得走投无路，抱着沒滿月的我，上地主黄盛坤家苦苦哀求，借了三吊錢，买了一具薄薄



的棺材，埋葬了父亲。

三吊錢債該付多少利息呢？母亲沒法算清。年年一到重阳节，地主就上門逼債，拿走了母亲苦掙苦攢的全部血汗錢，还是頂不了利息。付不清的利息要算作本，就这样年年本上添本，利上滾利，这笔債怎么也还不清了。三吊錢欠到第五年，黄盛坤立了条規定：要母亲在每年的重阳节这天，交清利息，还得請他們吃一頓酒，債才讓繼續拖欠。母亲哪里敢講半个“不”字，只得应承下来。从这以后，每年的重阳节，就成了母亲难过的一关。快到这个节日时，母亲就提心吊胆，沒命地砍柴攢錢。

十年来，母亲风里来雨里去，起早摸黑，成年劳累，还是吃糠咽菜。三吊錢，像座大山压在她头上，真是一笔閻王債啊！

有一次，我气虎虎地对母亲說：“找黄盛坤算帳去，看到底欠他多少！”

“你敢！”母亲胆怯地按住我，“人家上通衙門，下連团总，有錢有势，誰敢去碰他！”

不管母亲怎么唠叨，我越想越气忿。三吊錢，不过值八斗米，为什么还了十年都还不清？为什么越还越沒个底？

我开始分担母亲的忧虑了。我知道，應該帮助母亲还清这笔債，往后才有安生的日子过。

有一天，卖完柴回到家里，坐下来吃晚飯，母亲对我講了个小小的打算。她說，要是拿出一部分存錢去买只小猪来养，到年底长到百来斤，卖出去，就能換到一笔錢；再把砍的木柴烧成炭，又能多攢几个銅板；养猪和烧炭两头一湊合，到明年

的重阳节，就有办法把那笔债本利一起还清。

一个夏天，就在劳碌中度过了。一转眼，又到了重阳节。重阳节，是父亲去世的忌日，也是地主上门讨债的凶日啊。

九月初九这天，地主黄盛坤穿着白绸长衫，戴着细纱的瓜皮小帽，领着三四个打手，来到我家喝债酒。我母亲手忙脚乱地照料他们，把长时间准备的鸡鸭鱼肉，炒的炒，燉的燉，蒸的蒸，叫我一盘一盘给他们摆上。他们喝了一会酒，上了酒劲，就吆三喝六地猜拳，把饭菜吃了个一干二净。吃了以后，黄盛坤掏出一方白绸手帕，轻轻抹一抹嘴巴，留下一个管帐的瘦猴子跟我母亲算利息，领着打手到别家去了。

瘦猴子打了一回饱嗝儿，翻翻帐簿，拨拉拨拉算盘珠，翘



起两个尖削的手指头，恶声恶气地说：“利息交粮八斗！”

“八斗？这不是同本钱一样多吗？”母亲吃惊地说。

瘦猴子从牙缝里“哼哼”冷笑两声，“本钱么，最初是三吊，拖了这十年，就没法算啦！”

我冲着瘦猴子大声说：“没法算也得算。你本钱没法算，利息怎么算得出？”

这句话刺中了瘦猴子的痛处，他涨红着脸说：“我给你算，我给你算，算！算！”说着，又拨弄起算盘珠子来，然后，把算盘推到我的面前：“今年得偿还东家债钱两担七斗粮。”

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狠狠瞪我一眼：“团子，你敢招是非！”又赶忙掏出瓦罐，尽数倒出积存的铜板，算了算，结果连利钱都凑不足。母亲求瘦猴子宽缓到年底，瘦猴子故意刁难，他端了个竹椅坐下来，说：“东家说了，今年的利钱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火，又冲他大声说：“你讲不讲理？钱叫你们刮干了，连欠几天也不行？”

“就是不行！”他一拍桌子站起来，“东家要不讲理，这笔债肯拖这些年？”

母亲看瘦猴子那副架势，晓得多说话没用，就狠一狠心，把喂了两个月的猪杀价卖给人家，才交清了利息。

瘦猴子夹着算盘、提着钱袋子走了，母亲一头扑到床上，伤心地大哭一场。没想到，几个月来的忙碌，没过重阳就全落空了。

为了还债，为了养活母亲，我想去学篾匠手艺，母亲缠不

过我，也就答应了。过了阴历年，母亲去外婆家凑了十五个毫子，选定元宵节这个吉日，带着投师费领我到桥角头，拜篾匠黄朝桂为师。

起初，黄朝桂什么手艺也不教我，老是叫我挑篾工担，帮打杂务。篾工担同我一样重，跟我的肩膀一般高，挑起篾工担，就得撑着脖子，踮着脚尖，喘着大气。为了学手艺，我咬着牙，挑着重担跟着师傅四村转。

跟了黄朝桂几个月以后，我才慢慢摸清他的底细。原来，他是一个流氓，经常在地主家出入，兜揽大批的篾工活计，做上一二十天，赚到一笔钱后，就到处胡搞女人，吃喝赌博。一到钱花光、输光的时候，他就无缘无故地找我出气。竹板和眼泪，伴着我过日子。我懊悔不该向黄朝桂投师，这个门算是摸错了。

六月的一天，我们在王山坑做活。晚上，天气很热，大人都凑到荫凉地里谈“三国”，小孩在谷场上捉迷藏。黄朝桂一吃完饭，撂下饭碗就走了。我寻思他不是胡搞女人，就是到赌摊去了。乘这个机会，我点起油灯，端到厅堂的暗角落，悄悄地学破篾，起先我还有所提防，到后来越破越专心，连蚊虫可都不管了。

正破着，黄朝桂忽然出现在我面前，眼珠一眨动，雷一般喝道：“你耗费东家的油，妈的！”朝我左膀子上就是一拳。我左手拿着的篾刀，被他一拳打向右手削去，削掉了右手一节食指，鲜血直往外涌。我痛得哭不出声，捂着手蹲在地上，额头直冒冷汗。无意中，看到地上那截削掉的手指头，血糊糊的肉

粘着白生生的一块骨头，心头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就一头栽过去，撞在黄朝桂身上。黄朝桂用手一拨，把我推倒在墙角里。我一滚起身，打算去找那把篾刀，黄朝桂一脚踢开篾刀，顺手抓住我的领口，“啪啪”搥我几巴掌。

削了指头以后，我再也呆不下去，但又不敢回家见母亲，只得四乡流浪。

九月间，我流落到茶籽畈。一个好心的篾工师傅邓受桂收留了我，叫我当他的“帮作”，一个月还给我十五个毫子零花，才使我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心想：世上也有这样的好人啊！

在茶籽畈邻近的几个村子里，人人赞扬我师傅忠厚公道。他走到哪一村，就受到哪村人的欢迎。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主席。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听从邓师傅的话，参加了儿童团。

1928年的冬天，茶籽畈邻近的各个村子，都火腾腾地闹起革命来。不久，就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农会把地主和祠堂的土地，一概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

第二年的春节，师傅叫我回家跟母亲过个欢喜年。我一到家门口，喜得大叫一声：“阿妈！”母亲赶忙迎出来。母亲也变了，穿身暗蓝色的新布褂，打皱的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见了我，不知说什么好，一把拉我坐下，从锅里端出一盘热腾腾的年糕，摆在我面前，指着说：“囡子，吃光它！”

“我们家也蒸年糕啦！”

“囡子，几个月来，妈好像隔了一世，谁想到天下变得这么

快！”母亲擦着眼窝里的泪花，說：“家里分到十四亩田，还分到一块茶山。”

“好啊！就是要跟着共产党鬧革命，才有好日子过！”我情不自禁地高声說着。

母亲見我这股高兴劲，也呵呵地笑起来。

“囡子，”她一把拉我走回房去：“那笔閩王債，已抗掉啦！三吊錢害我牵腸挂肚十几年，沒想到就在一个冬天，一下子抗掉了。”接着，母亲又談起农会，說农会的人会講道理，能办事。她还問我：“听人說，茶籽畈的农会主席是你的师傅？”

“是啊，就是邓师傅！”

阿媽乐得直拍手，說：“这就更放心了，你要听他的，向他学着点！”

我跟母亲欢天喜地过了个翻身年，又回到师傅那里。

1929年10月初，我得到了母亲和邓师傅的贊同，参加了光荣的紅軍，在党的领导下，为劳动人民打天下。

三 笔 血 债

王 小 山

第一笔血债

我的老家在河北唐县，那里不仅土地肥沃，盛产粮棉，而且有着储藏量丰富的煤矿。离我家不远就有一家煤矿。可是，在旧社会里，小麦产得再多，农民一年到头还是勒着裤带过日子。许多农民被地主迫得走投无路，就跑到矿上当工人。当了工人，还是免不了鞭打和饥饿。

从我一家的遭遇中，就可以看出唐县一带的农民，是怎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

1936年，我已经六岁了。那年农历四月的一天，姐姐带我在家玩，我肚子饿得很，就嚎啕大哭起来，嗓子都哭哑了。“姐姐，我要吃馍，饿死啦！”仅仅比我大五岁的姐姐没办法，就哄我说：“莫哭了，爸爸下工回来买回多多的米，让娘煮稀饭，我们不吃，叫你吃得饱饱的。”我左等右等还不见爸爸回来，又哭闹着要饭吃。姐姐哄不住我，气得打了我两巴掌，接着自己也哭了。

“爸爸回来了！”我連眼泪都顧不上擦，就跑到爸爸的身边。“爸爸！米买回来了嗎？我肚子餓啦！”爸爸只說了一句：“小山，你爸沒能耐呀！”就一头摔倒在地上。我和姐姐，都吓呆了。我趴在爸爸身上哭喊着。姐姐毕竟比我大几岁，哭着跑出去找娘去了。

娘背着不滿三岁的弟弟赶回来，和爸爸一起背煤的大哥也跑回来了。“爸爸被工头打……打伤了。”哥哥抽泣着說，說完就扑到娘怀里大哭起来。

听爸爸說，我家原先是农民，自家还有几亩地。1934年，几亩地被地主霸占了，我們一家只得出外逃荒，祖父和叔父在逃荒中失散了。爸爸带着十三岁的哥哥，来到煤矿背煤。

在矿井里，到处可以看到矿主們用皮鞭抽打工人。但是，比鞭子更狠的是矿主的心。他們用各种方法强迫工人多背煤，規定工人有多高的个，就得按他們的量具背多少煤，誰要是少背一些，或停歇一下，鞭子就抽在誰的身上。連我哥哥这样的童工，他們也饒不过。

爸爸和哥哥每年背出来的煤，足足能卖几百块銀洋，可是一年却只能拿二十多块工錢。就是这二十多块錢，矿主們还七折八扣，什么“保險費”、“修具費”、“工服費”，三下五除二，少說也要扣掉一半。卖了一年的劳力，父子俩只能得到十来块錢。

矿工們受尽牛馬苦，每天只能喝上兩頓連糠帶菜的稀湯。天长日久，我哥哥得了严重的气喘病，經常大口大口地吐血。爸爸年迈力衰，又不幸得了水肿病，腿和臂像沙罐子，明光淨



亮的肿得怕人。肿在爸爸身上，疼在儿的心上。大哥看到爸爸肿得这样厉害，就想给爸爸请个假歇两天。“啊！这还真是个好崽子呢。”工头顺手扬起鞭子就铺头盖脸的朝我哥打下来。

记得那天早

晨起来，娘看着爸爸实在肿得不行，就劝爸爸不要去上工，在家歇几天。爸爸擦了一把泪说：“不上工，这七张嘴，不能用线缝上呀！”

当风烛残年的爸爸，不能再为老板拼命挣更多钱的时候，矿主就借口说他背煤走的慢，偷懒，在一阵鞭打之后，把爸爸开除了。娘拖着我去矿上，想请矿主借几个钱给爸爸治病。

“……你们行行好，多积些阴德……”娘跪在矿主面前哀求着。

“哈！哈！”坐在软椅上的矿主像母猪喘粗气似的哼哼哈哈笑起来。“阴德，阴德，哈哈，哈哈……”

“他给你们干过活呀！你们就行行好，给他治一治，将来

还是你们的人呀！”娘忍受着万分的凌辱，从牙缝里挤出这一句话，只希望矿主发点善心。她哪里知道矿主的心是黑的呀！

“治好！治好！治好还有啥用，恐怕每天背的煤，还不够他的饭钱呢？”

娘的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突然射出两道强烈的光，直盯着那些家伙，颤抖地叫喊起来：“你们！你们！”说着拉我就往外走。

不久，一家人都害了水肿病，全躺下来了。说不清过了多少日子，也说不清是啥时候，我昏沉沉的觉得有人摇我的膀子，又听到一片哭声。睁眼一看，原来是母亲，她披散着头发说：“你爸爸死了。”

我病好以后听娘说，爸爸死后是用两个破缸对起来，埋在乱坟岗子上的。

罪恶的旧社会，吃人的资本家，夺走了我爸爸的生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第一笔血债。

第二笔血债

父亲死后，矿主为了要霸占我们兄弟三个劳动力，硬逼着娘改嫁。母亲死活不肯丢下儿女，我们又怎舍得娘呢。哥哥对娘说：“娘呀！我们死要死在一起，活要活在一块。”

不久，慈爱的娘，带着我们兄弟五个逃出了火坑。但是，在那恶狼当道的年头里，一个穷寡妇，带着年岁最大不过十五岁的五个孩子，哪儿去找求生的道路呢？！

娘背着一口锅，拖着儿女颤颤抖抖地在黑暗的道路上走

着。狂风夹带着沙上，吹乱了娘久久沒有梳理的头发，吹起了她破碎的布褂。一条条皺紋刻在她脸上，娘蒼老多了。

1937年春，我們沿途乞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老家，走出了祖宗几輩住过的唐县。一天，我們住在一个村头的破草房里，离这間破草房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姓王的老太太，她也是一个穷人，只有一个女儿，卖给本村地主作丫头了。“穷人見穷人亲”，老太太是个好心腸的人，她見我娘拖着我們几个很困难，就对我娘說，村里地主还想买个丫头，問我娘讓不讓姐姐去。

儿女是娘身上的肉，当时，娘搖了搖頭。

做娘的，都知道娘对儿女的心，老太太再也沒有說什么。

日子过了不久，到了三四月間，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飯越来越难要了。怎么办呢？娘眼巴巴地看着我們一天天消瘦下去。尤其是不滿四岁的弟弟，眼看就支撐不住了。“要留条根！”娘下了狠心，找到了王老太太，还没开口，泪水早挂满了她那布满皺紋的脸。王老太太見娘来找她，早猜到了娘的心事，也流着泪說：“嫂子，卖儿卖女这是財主逼的，不是咱做娘的心狠。我那丫头也是为了活命，二斗麦子卖给人家的。孩子去人家，虽說苦一点，累一点，总可以活出命来。再說，你这四个小子，将来大了，总有个指望，有了人就不怕穷呀！”听到这里，娘伏在王老太太的怀里慟哭起来。

資本家的心是狠的，地主的心也是狠的。十二岁的姐姐，卖到地主家以后，挑的水桶和她一样重，背的柴捆和她一般高。在她瘦小的身上，开始印上了一条条发紫的伤痕，挨打受

罵，天天不斷。

一天，天擦黑，我和娘討飯剛回家，姐姐從門外跑來，一頭撲到母親的懷裡。看見姐姐回來，我高興極了，忙從要飯的籃子裡拿出一塊地瓜塞給她。哥哥還問她，地主對她好不好？

姐姐哇地一聲哭了。

“孩子你怎麼啦！”娘問她。

“娘！他們打我。”姐姐掀起衣服，露出滿身的傷痕。

娘一看就傷心地哭起來。

“娘！他們打姐姐，不讓姐姐去了！”我和哥哥忿忿地說。

“兒呀！你們還小，不懂得娘的苦處呀！”娘輕輕地撫着姐姐，又一把拉過我，哭得更傷心了。“孩子，咱們吃了人家的糧呀！不回去咋辦呢？”

“娘，咱們今晚上離開這兒吧！”大哥說。

“逃，逃到哪裡，也逃不脫人家的手心。”

突然，一道手电光從窗外射進來，房門被“啪”的一腳踢開了。姐姐嚇的噎住了哭，哆哆嗦嗦地往母親身後擠。

“她不去了！”大哥跨前一步，攔着進來的人說。

“不去！好！世道上沒有這樣的便宜事。”狗腿子凶煞煞地說。

“不，不，你們饒了她吧！”母親前言不答後語地求他們。

狗腿子不由分說，從娘身後，一把將姐姐拉過去，就是幾個耳光。

“你！不要太欺負人了！”哥哥順手抓起要飯棍，就向狗腿子打去。



“我的小亲爷！你啥时候吃了龙虎胆，敢这样大胆。”娘忙拉着哥哥。

“娘，怕他们干什么？头割下来，还不是碗口大的疤！”哥哥竭力挣脱着。

狗腿子看见势头不对，没敢多停留，拉着连哭带喊的姐姐就往外走。

这一夜，是多么难熬的一夜，我们围着娘没合一下眼，想着这饥饿的日子和可怜的姐姐，心里就像插上万把刀子，绞的可疼呀！

不久，我又病倒了。那间草房，上露着天，下积着雨水，团团雪花飞卷着鑽进来。母亲和哥哥都出去讨饭去了，我一个人蜷曲着身子，藏在破麻包片里。

“小山！小山！”出人意料，姐姐又回来了。

我从破麻包片里鑽出来，爬到了姐姐的怀里。姐姐从身上取出一个菜饽饽塞到我的手里。

我拿着菜饽饽抬头看着姐姐。她的脸青一块紫一块，左边的耳朵流着脓血，肿起个大疙瘩，凹陷在眼眶里的一双无神的眼珠，痴痴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雪花。

“姐姐，他們又打你了？”

“沒……沒有。”

坐了一会，她突然站起来，急速地向門外跑去。但脚刚迈出門坎时，她又跑了回来，把身上穿的破棉袄脫下来，盖在我身上。

“給娘說，……”她拖着沉重的步子，低着头在草房內来来回回轉了三四圈，才說：“小山！以后多听娘的話，帮娘做活。”

“姐姐，外面下雪，你冷！”我光着屁股爬起来，把棉袄递给她。

“姐姐不冷，留給娘穿。”外面一陣狗咬声，她低声說：“我回去了。”

哪知道，就在那一天，她跳进了村东头的



深井。

春节来临，雪片乱飞。有钱人家杀猪宰羊，除旧迎新的爆竹一声比一声响。娘抱着从井里捞起来的姐姐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狼心狗肺的地主，逼死了我的姐姐，还不饒我們，說我姐姐死在年关，冲散了他家的喜气，把我們撵出了村子。沒几天，六岁的弟弟也連冻帶餓死去了。

这样大的天地，怎么連穷人立足的地方都沒有啊！

这是刻在我心灵深处的第二笔血債。

第三笔血債

娘背着鍋碗，帶着我和两个哥哥，一天又一天，一乡又一乡，四处流浪。1940年元月，我們出了关，来到了內蒙古的兴和县。关外的严寒，迫使我們不敢再往北逃了，就在十三号村庄住了下来。

在十三号村住下以前，也就是在我們沿途乞討中，一天来到了广昌县的三林村，娘又以二斗粮食把二哥卖給了一家富农。直到1955年我回家探亲时，才得知二哥在富农家里，也被折磨死了。

在十三号村里，經人說合，我們母子三人一起变成了姓刘的地主家的长工，大哥每年有三十块钱的工錢，我和母亲只管飯吃，沒有工錢。

給地主扛活，当然又苦又累，但是，总算不再要飯了。在娘那憔悴的脸上，有时也露出一笑。娘有时盘算着，哥哥一年有几十块钱的工錢，积攢几年，将来买点地，日子也就有

点熬头了。哪里知道，旧社会不容穷人伸腰喘气啊！沒有多久，就在我哥哥的那几十块工錢上，竟出了事情。

那是給地主扛活的第三年，大哥心里想：娘年岁越来越大了，不能老这样給人家干活。他就去向地主提出要工錢。地主皮笑肉不笑地說：“这样吧！現在我一时还沒錢，你不是想自己种点地嗎？好吧，我家村东的二亩地，你先种着好了。”

乍听起来，这話还滿像人說的，誰料到这是一个陷阱呢！

我和哥哥跑到地里一看，真是气坏了。那是啥地呀！滿地的石子比鷄蛋还要大，不要說种庄稼，就是种草也不会长的。我和大哥气得要找地主算帳。娘說：“人凭俭，地凭勤，种就种上吧，別再惹事生非。”

二亩地，我和大哥忙着拾掇了几天，全部种上了大烟。

当时，一两烟价值担把粮食，所以地主老财不惜工本，在地里上豆餅、麻參，有的甚至給地里上油。割烟的季节快到了，地主的烟地里，

烟苗一片青綠，一朵朵白的淡紅的花儿盛开着。我家的烟地，底子瘦，又缺肥，烟苗又稀又矮又黃。一天，大哥正在拾掇烟地，乡丁把他叫了回来，說是要交稅，数目



是一百块大洋。

“什么，交烟稅？別說沒收下烟，就是收下了，連种一块称給你們，也不够一百块大洋！”大哥气虎虎地說。

“好！你敢抗稅，早就打听你們是从八路軍根据地来的，私通八路！”說着，几个乡丁一窝蜂围上来，把哥哥綁走了。

这真像晴天霹靂啊！娘几乎吓晕了过去。“私通八路！”这还了得，这是要杀头的。娘似疯了一样的跑去找地主。万恶的地主，大門紧閉，任凭娘在門外怎样哭喊，也不開門。

哥哥在伪乡公所里，被打得死去活来，还被关押了一百二十多天。我和娘东奔西跑，托人求情，干了几年的活，积下来的一笔血汗錢又被地主、反动派敲的干干淨淨。

这是地主勾結反动官府陷害我家的又一笔血債。

1945年解放軍到兴和县，官府被打倒了，地主被斗倒了。我的大哥光荣地参加了八路軍。第二年，我的大哥因負伤残废复員回家了，我就又拿起枪杆，走着哥哥沒有走完的道路，要为天下受苦的父母兄弟姊妹报仇雪恨。

(陈小鈞整理)

一块門板

白 华

我的曾祖父是这样死的，七月天，給地主胡积德耙地，昏倒在耙地的耙縫里，被地主的大水牛給拖死了。死后，地主对我祖父說：“他給我干的是‘月活’，沒有干完就死了。这样吧，你不要我的工錢，我不要你的飯錢，两拉好啦！他死的时候拖坏了我的两根耙釘，看点情面，也不要你賠了。”說完，他用左手捂着鼻子，右手拿着拐杖，插了插我曾祖父身上的稻草，詭譎地說：“哎呀！用稻草裹着不太好吧？这样升不了天罗！”說罢，对着他的喽罗：“去，抬块門板来。”就这样，我那劳苦一生的曾祖父，带着滿身的伤痕，睡着一块門板，入土了。

一年以后，地主拿着帳本，逼債来了。我祖父心想：“我沒欠你們的錢啊！”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說：“我不欠你的錢！”地主一听，翻动着白眼珠，拨弄着算盘子，凶恶地对着我祖父吼起来：“你的死老头子去年睡去了我的一块門板，值洋十二元，合稻子一石二斗，加五的利，五得五，二五一十，总共是一石八斗，你还想抵賴嗎？”这簡直是攔路搶劫！可是有什么办法呀？！在那个时候，脚踏人家地，头頂人家天。哪有旁人說話的

地方呢？我祖父气的不行，告到了县衙。可是，县长是胡积德的“八拜之交”，判决的结果，给了我祖父一个“赖债违法”的罪名，打了四十大板，罚了三个月的苦力，人拖成了一把皮包骨头，才放回来。往后，每年都是：粮食登场，交租还债，收割完



毕，家里也粒米不存。于是，草棚上一把锁，一家人逃到外乡，乞讨活命。到了第二年，田活出来了，又奔回家，吃糠咽菜，艰难地种上几亩租地。秋收了，粮食上场，又和往年一样……时间一年一年地磨过，祖父的背一天天弯下去了，父亲的腿也一天天地僵直了，可是债却越背越重了。到1941年，一块门板竟变成了二十几担粮食的债累！

1942年，祖父也和曾祖父一样，累死在地主的地里。临死前，他对我父亲说：“我没有给你留下别的，只有一块门板——二十几担稻子的债，一条逃难的扁担。”

祖父一死，日子就更难熬了，连租田也种不成了。这时候，胡积德当上了伪县长，他的儿子也当上了联保主任，对穷人的压榨也更残酷了。我家没有办法，只好都去给胡家干活，父亲给他当“月工”，母亲给他当佣人，我给他当放牛娃。干这样的活，都只限于农忙季节，农闲了，地主也不要了。一家人辛辛苦苦劳动几个月，不但分文不能进，反而要给地主打一个比往年的数目更大的欠条，然后，挑着担子，一家人又流落到外乡去。1946年冬，父亲由于连急带累，吐血不止，不几天，就拖死在外乡的荒草地上。临死时，他对我说：“华子，胡家这块门板的债，我们家世代代是还不清的了，你要想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那个社会里，哪儿又有我们穷人立脚的地方呢？妈妈狠心把我的妹妹送给了人家，然后对我说：“华子，胡积德这块门板的债，逼死了咱家三代人，现在只剩下你这条根了，咱们不能叫他逼死在外面。回去吧，孩子，回去顶着，他要钱没有，要人有两个，命有两条。”

回到家乡，又苦熬了两年，到1948年，在地主的帐本上，我家“欠”的债，已经是四十几担稻子了。

1949年，家乡解放了，我家也解放了。我们斗垮了地主，烧毁了地主的帐本，穷人见到了青天。在镇压胡积德的时候，他那两只贼眼闪着狼一样的凶光盯着我，咬牙切齿地说：“穷小子，总有一天，还是要你还清我这笔债的！”这是他的梦想。现在，人民的江山越坐越牢，我也当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战士，正百倍警惕地保卫着咱们的胜利果实哩！

越逃越荒

朱振昌

“旧社会里人吃人，走遍天涯难逃生。”解放前，为了死里求生，我家曾经四次被迫逃荒。从苏南到苏北，从深山到海边，始终没有逃出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派的魔爪，没有挣脱穷困、屈辱、死亡的命运。全家三代十口，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人。这悲惨的遭遇，这深仇旧恨，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那是1937年的夏天，日本鬼子逼近上海，国民党政府丢下老百姓逃跑了。资本家们也都卷起金银财宝溜走了。那时候，我家全靠爹和大哥当码头苦力挣钱过日子。轮船公司关了门，一家老小立即陷入了绝境，烧火无煤，做饭无米，连喝口水也没钱买。偏偏我大哥又染上了重病，真是祸不单行！咋办呢？在城市是再也活不下去了，要逃荒吧，哥哥又寸步难移。爹娘合计了一整宿，决定留下爷爷和嫂子照料大哥养病，爹娘领着二哥、二嫂、三哥和我，逃荒到苏北射阳去。

本来爹娘要爷爷和我们一起走，他高低不肯。爷爷曾经给地主扛过五十年活，他不愿意再去乡下当地主的牛马，又舍

不得离开奄奄一息的大哥。沒想到，我們刚到射阳不久，他老人家就拄着竹棍找我們来了。我們走后，上海簡直成了人間地獄，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大哥沒吃沒喝，病情越发严重，爷爷和大嫂也餓得头昏眼花。总不能眼巴巴地餓死，爷爷无可奈何，只好領着大哥大嫂，乘船到苏北来找我們。路上四天沒見米粒，船上风浪又大，大哥經不起折磨，沒来得及再見一眼爹娘，就在船上咽了气，尸体被押船的巡警推下江去。爷爷上前阻攔，被巡警打得滿嘴流血，昏倒在船上。大嫂哭得死去活来，覺得沒臉再見公婆，半路流落他乡去了。……

爷爷說完別后的遭遇，拉住爹的手說：“爹对不起你，早来就好了。”

爹握着爷爷的手，只是叹气。娘泣不成声地說：“爹，不怪你，逃到这里也沒法活，这是命啊！”是啊！旧社会就是專門捉弄穷人命运的。爷爷刚逃到射阳，我們全家就准备着逃出射阳去。

在射阳，爹和二哥給地主扛活，娘和二嫂給地主家作零活，三哥領着我成天挖野菜。一家老少拚死拚活地干，也喂不飽肚子。大家都指望秋天打下粮食，能喘口气。誰料稻谷还没有抽穗，老天爷一連下了三十多天暴雨，禾苗全被淹沒了。粮食顆粒未收，工錢被地主扣得半文不剩。全家走投无路，只好挑起担子，再次逃荒。

十月隆冬，阴霾的天空飘着冰凉的雨絲，爹和爷爷挑着担子往前赶，娘怀抱着才滿月的小弟弟，領着我們哥儿四个，踏着泥濘的道路，向荒野走去。



一路上，我們沒錢沒糧，全靠乞討度日。但是，在那荒年灾月，穷人給不起，富人不仅不願給，还常常放出恶狗来咬人。有一次，我的左腿給狗咬得露出了骨头，疼得在地上打滾，地主却在台阶上哈哈大笑。一家老小餓得皮包骨头，特别是衰弱的娘，給弟弟拖累着，瘦得不像人，走路直晃悠。没办法，爹橫着心，脫下身上的破棉袄把弟弟裹了裹，等娘走远了，把他輕輕放在路边。小弟弟嘶声哭叫，爹爹不敢回头撒腿就跑。娘发现爹把孩子扔了，哭着要往回找，爹拉住她劝着：“跟着咱，也是死，讓他自己找条活路吧……”說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失声哭起来。全家人心如刀割，可是誰也沒有勇气把弟弟抱回来。

沿途乞討流落了四个半月，我們来到苏西北的一个叫蔣滩的地区。这里四野都是荒地。全家一合計，再走也沒奔头，就决定住下开荒。当下，在山脚下支起两个窝棚，全家老少，在

滩上干了一冬，开出了七亩五分生荒地。看到庄稼长得挺壮实，大家乐得合不上嘴。眼巴巴地看着玉米吐了穗，爹高兴地說：“总算有个指望了。”誰知蔣滩的地主“土霸王”突然闖来了。他装着吃惊的样子吼叫起来：“好家伙，私自开我的山，破了我家风水，你們好大胆子！”說完，几个狗腿子如狼似虎地扑上来，要拉爹去見官。吓得全家大气也不敢出。經過爷爷和娘苦苦哀求，才把爹爹放了。可是我們千辛万苦开出来的七亩五分地，被狗地主連粮带地一下子沒收了六亩，剩下的一亩五，还要三七开，向他納租。我們开了一冬荒，地主不吭声，如今庄稼长起来了，他却跑来收地要租，这不明明是訛人嗎？二哥实在气不过，秋收算帐时，頂撞了地主几句，“土霸王”被問得理屈詞穷，怀恨在心，当夜，就差了一伙人，把我家的两間窝棚一把火烧了，地里的庄稼也被他割个一干二淨。末了，一根繩子綁起了二哥，狗腿子阴险地笑着說：“恭喜你，当上了国軍！”娘跪下求饒：“行行好吧！你們毀了窝棚，收了地，人可动不得！这是我的命根子！”狗腿子哪里肯听，照着娘胸口就是一枪把，把她打昏在地。几个人連拉带推把二哥綁走了。

天漆黑漆黑的，山风呼嘯，野狼在近处嚎叫，一家人围着廢墟抱头痛哭。家被烧毀了，粮食被搶光了，人給拉走了，这里再也活不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啊！

怀着絕望的心情，扛着剩下的唯一的破鉄鍋，我們又踏上逃荒的絕路。途中，三哥被日本鬼子抓了伏，二嫂逃回了娘家，只剩下爷爷、爹、娘和我四口人了。爹領着我們像游魂一样，游了五个多月，逃到了苏东南海边上。前面沒路可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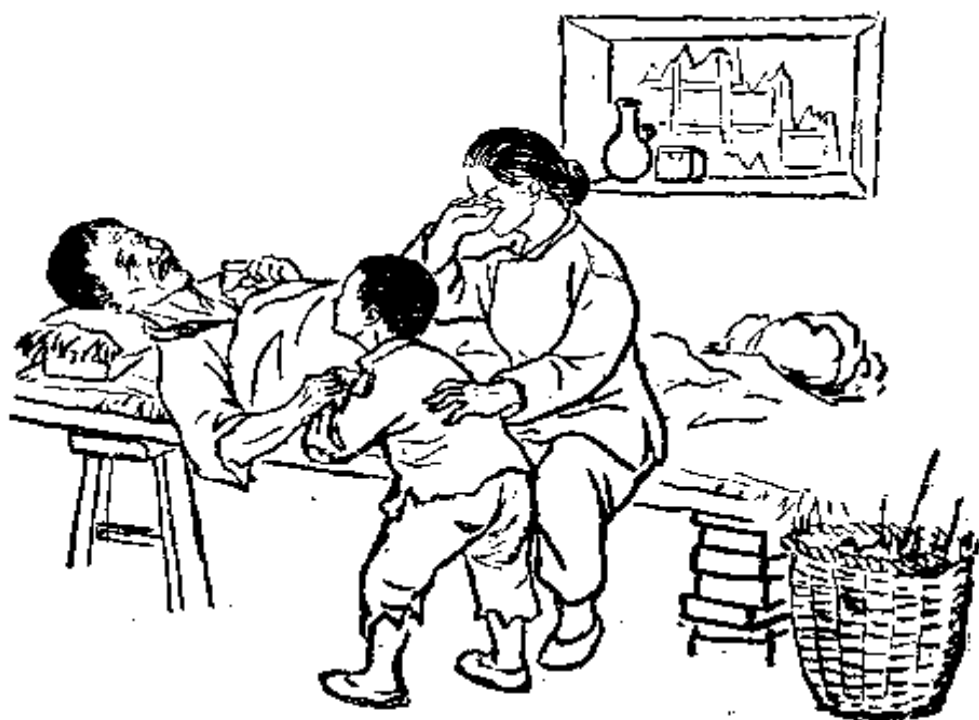
我們就在那里住下来。白天在盐場給老板晒盐,黑間給地主看葦塘掙点血汗錢混日子。

呼呼的海风,刮得人睜不开眼,火一样的太阳炙得盐場直冒火星。爷爷已經是七十七岁的人了,喝的是烂瓜湯,干的是牛馬活,全身瘦得只剩几根骨头。一天晚間,爷爷拖着身子走回工棚来,一头栽倒在葦草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說:“我不行了,到头了,你們爭口气,把孩子拉扯大吧。”当晚,爷爷咽气了。

可怜他老人家从九岁起就給地主扛活。生活逼得他从农村逃到上海,又从上海逃到苏北乡下,劳苦了一輩子,沒吃上一頓飽飯,临死連一块板、一张席也沒有,光着身子埋在海滩上。

爷爷刚死,大祸又临头了。一个大雷雨的晚上,爹給地主看葦塘,遇到一个姓陆的保长領人来偷葦。爹怕日后担不起責任,連忙鳴鑼报警。陆保长险些被抓,因此怀恨在心。十几天以后,他把一堆鴨毛撒在咱的葦棚前。然后,鳴鑼捉賊,硬說爹偷了他三十只鴨子,把爹綁起来。娘上前求饒,滿口牙齿都被打掉了,當場昏了过去。吓得我趴在娘身上哭了一夜。

爹被綁进了乡公所,吊在房梁上,竹鞭抽,香火烧,还灌辣椒水,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們去求盐場老板保爹出獄,他不但不帮忙,反說爹不是个好人,把三个月的工錢全扣了。后来,还是盐場上的十几个工友跑到乡公所,把爹救了回来。可是他已經是遍体鳞伤,肚子鼓胀,連口烂瓜湯也喝不下了。临死以前他牙齿咬得格格直响,不住声的罵:“这是什么



世道！这是什么世道！”又拉住我说：“老四，这仇……仇要报呀！”

爹一死，剩下我和娘相依为命，日子更难挨了，就像掉在黑咕隆冬的深井里，找不到出路，喘不过气。直到苏南解放了，我们才见到了青天。

“白眼窝”

刘益民

我家在陕西省乾县南防村。家里共有七口人，原来有三孔破窑洞，和老一辈传下来的三亩地。村里有一家大财主，外号“白眼窝”，还是国民党保安队的大队长。他家钱财万贯，土地千顷，兼开一座大油房。“白眼窝”仗着有钱有势，佃地放债，高利盘剥，害得穷人没法活。

1930年的夏天，接连三个月没有下雨，麦子歉收，全村闹饥荒。孩子饿得哇哇叫，大人瘦成骨架架。一天，娘对爹说：“这样下去不行呀！还是活人要紧，把地卖了吧！”

爹起初不同意，但是，想不出别的法子，在屋里转了几圈，就走出家门，跑到那三亩老地头上，痛



哭了一場，就向“白眼窩”家走去。“白眼窩”見是我爹，問：“劉老头，你來干啥？”

“老爺！我家那……那三畝地，賣……賣給你吧！”爹說罷，淚珠嘩嘩地往下流。

“白眼窩”早就看中了我家那三畝地。幾次派人來買，我爹死也不肯。如今爹找上門去賣地，他却裝出不想要的樣子，說：“劉老头，這早年頭，買地就是買災呀！”

“求求老爺，我家老少七口，揭不開鍋蓋呀！”爹乞求着。

“白眼窩”擺出了一副慈善的面孔，說：“劉老头，本來我是不想要地的。不過嘛，我們鄉里鄉親的，不能見死不救。這樣吧！地我收下，明兒你來取三担麥子！”

“老爺，我那地可是塊肥地……”

“白眼窩”的眼白一翻，說：“這可不是我情願買的，你不賣咱就不買！”說罷，就要扭身往回走。

踩着火要水澆，為了醫得眼前疤，那管剝掉心頭肉，爹爹只好答應了。賣了地，眼前喘了一口氣，可往後家里的生活就更沒指望了。爹拚死拚活地賣工，可掙的錢還不夠家里喝稀湯湯呢。

日子越來越過不下去了。正在忙秋收的時候，妹妹得了重病，沒錢醫治。娘哭着求爹說：“借吧！活人要緊哪！”爹沒吭聲，腦門上滲出了黃豆大的汗珠，一咬牙，走出了窑洞。

爹到“白眼窩”家借了幾塊錢，來醫治垂死的妹妹。從此，我家欠下了“白眼窩”家的債。秋前借一元，秋後就要還兩元。爹為他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全部工錢還不夠還債。可是



家里有人有口要吃饭哪！没有办法，留下娘照料妹妹，姐姐和我都出去捡吃的。一天早上，风刮得呼呼叫，天刚蒙蒙亮，姐姐就领我去山后采野菜。刚上山坡，就听有人喊：“狼！狼！”姐姐一回头，只见一头大黄狼冲过来了，姐姐吓得脸色苍白，急忙把我推到一边，自己诱着狼跑开了。没有跑多远，狼就把她叼走了。

1945年的腊月头上，“白眼窝”家忙着杀猪宰羊，准备年货，我一家人还穿着破烂单薄的衣裳，蹙缩在一起。屋里落满了雪。风从洞口吹进来，吹得人身上像刀割一样痛。第二天，天刚发亮，雪还在下着，娘就起身到一个亲戚家，想借点吃食。娘走不多久，“白眼窝”就带着一伙家丁，上门逼债来了。他们往洞口一站，就喊：“刘老头在家吗？”

“在。”爹有气无力地回答。

“腊月啦，该还债了！”

“老爷，哪来的钱呀！我妻儿老小，连口也糊不住啊！”

“他妈的，穷鬼赖债，好大胆量！”“白眼窝”气势汹汹地指了我一下：“把他拉去，卖了顶债！”

狗腿子们应了声“是！”连推带打的就把我拖出窑洞。爹上前来拉我，被他们一脚踢昏，倒在地上。我那刚满周岁的小妹妹，又惊又饿，跑出来找娘，不幸也被狼叼走了。

我当即被送到县上，因年纪小，官家不要。在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了娘。娘儿俩一块走回家，见爹倒在床下，还是昏迷不醒。邻居们跑来说小妹被狼吃了。娘一听，立时昏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我抱着娘喊：“娘！娘！”喊了好久好久，才



把娘喊醒。

黄昏的时候，邻居们都回家了。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了。我跟娘喊天天不吭，喊地地不应，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1948年，家乡解放了，人们欢欣鼓舞庆解放。那年我十六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没多久，部队执行其它任务，离

开了这个地方。那些像蝗虫一样的匪军又来了。他们一到村里就挨户搶劫，抓伕抓丁，鬧得烏烟瘴气。“白眼窝”也回来了，穷人們又回到那痛苦的岁月。

1949年腊月，家乡解放了。吃人肉、喝人血的地主阶级被斗倒了，人民的政权建立了，农民分得了土地，作了主人。从此，跳出了苦海，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随着部队，我順便回了一趟家。娘见到我，高兴得說不出话来，眼泪直往下淌。过了好一会，娘才說：“孩子！可要記住，是共产党、毛主席給咱带来的好光景！不要忘記过去啊！”听了娘的話，我禁不住热泪往外涌，心里像一把火，烧得全身发热，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可我心里說：“娘，記住了，不会忘記过去，一定記住；过去的苦是誰給的；今日的甜是誰給的。”

（肖年才整理）

“大鯊魚”

勵承國 高金德 施均濟

在旧社会里，农民头上有地主，漁民头上有漁霸，广大漁民同农民一样，世世代代受欺榨。下面是福建省沙埕漁民过去所受的剝削和压迫。

“吸血蛇”

解放前，沙埕港有个大漁霸刘元謀，就像人間的“大鯊魚”。刘元謀父子，連同他的弟弟刘尾、亲属刘吓續等，占有全港百分之八十的大漁船，雇了二百多个漁工。刘元謀还開設了一个牌号叫“刘荣太”的大魚牙。他又是当地反动民团团长，在省里、县里的反动官吏中，熟人很多。国民党县党部書記长繆怀珍，伪县长关錫璋，都是刘家的常客，和刘元謀称兄道弟。沙埕鎮的伪鎮长刘忠文，还只能算是他手下的一个帮凶。刘元謀就以反动政府做靠山，在沙埕港上橫行霸道。

刘家魚牙里杀气騰騰，門口常有武装团丁看守，还有一条武装的巡邏船，在海上監視漁工捕魚。刘家魚牙不但用低价强迫漁民出售漁貨，还垄断囤积粮食，以高价卖给漁民……。

“刘荣太”，好像是一条纏在沙垵漁民身上的吸血蛇，沙垵港的漁民，哪一家沒有受过“刘荣太”的压榨？我們只在漁民江正山、欧陈金、李秋发、连风等几家跑了一趟，便听到了許多血泪斑斑的慘事。

三代深仇

漁民江正山和漁霸有三代深仇。

江正山的祖父江猴冬，是漁霸的雇工。那时候，他每天下海捕的魚，要交六成給漁霸，归自己的四成，又得按市价五折卖給“刘荣太”，并在那里换高价的粮食。这样层层盘剥，能有几个錢到手呀！江猴冬在世时说：“抓到一条大鯊魚，也剩不下一条魚尾巴。”整年拚命在海上捕魚，却換不到一家人的口粮，只得吃小杂魚、海草、番薯渣度日。有一次，江猴冬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向漁霸借几十块錢。向漁霸借債，那等于吃下“毒葯”。借了錢，債沒有还清，漁霸还不許你出外謀生。几十块錢的債，江猴冬就等于卖身給漁霸了。可怜的老人，当了一辈子牛馬，到死时还没有还清这笔債，儿子江宝发又得卖身給漁霸，替父还債。

江宝发到漁霸家里当雇工，漁霸却不发工資給他。有一次，他向漁霸討工錢，漁霸冷笑两声，說：“你父亲的債沒还清，还想拿工錢？起碼得給我干五年，才能抵債。”江宝发拿不到工錢，一家四口只得吃海草充飢。1941年的冬天，当地发生灾荒。江宝发一家四口餓了好几天，向漁霸討工資，还是分文不給。江宝发不忍看着一家人啼飢叫餓、走投无路，就撇下了老

母妻儿，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江宝发死后，江正山的母亲改嫁了，祖母拿着要飯棍乞討度日。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江正山还是泪水縱橫。他說：“我一家三代給漁霸害得够惨了。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橫行的时候，有哪家漁民沒有伤心事。在我爸跳海的那年，我們村里就活活餓死十三人，有四十多家卖了妻子儿女。漁霸刘元謀是我一家的仇人，也是我們沙堤港所有漁家的大仇人呀！”

父子当牛馬

当年，当了漁霸的雇工，固然受尽欺榨；沒当雇工的漁民，也逃不脫漁霸的毒爪。漁民欧陈金父子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欧陈金現在已經六十多岁了。当他年輕力壮的时候，是沙堤港上数一数二的捕魚能手，身体强，技术高，自己还有一条漁船。但是，他捕的魚再多，也經不住漁霸恶毒的盘剝。那时捕到的魚，除了进漁霸牙行以外，沒有第二条出路；漁霸任意压价，并且用大秤（一百六十斤当一百斤）收进；漁家卖了魚，还不够补网、修船和吃飯。即使像欧陈金这样的漁家，也摆不脫歌謠里說的那样穷苦的生活：

漁网破了沒綫补，
为补破帆剪被單；
搗来鮮魚漁霸吃，
剩下残骨自己尝。

.....

买新网,补旧船,要到“刘荣太”;买粮食,买柴火,也要到“刘荣太”。欧陈金渐渐欠上渔霸的债了。没过几年,本生利,利滚利,愈陷愈深,“刘荣太”的帐房把算盘“的答”一打,欧陈金竟欠了刘家五千元巨款:

灾祸落到勤劳的欧陈金家里来了。1937年的一个冬天,刘元谋亲自带着挂枪的团丁上门来逼债。刘元谋板着一副铁青的脸,连宽容几时也不行。最后,欧陈金被渔霸逼着,把自己的渔船、渔网和两间住房,折价四千元抵债,剩下的一千元,欧陈金和他四个儿子全去刘家当雇工抵债。

欧陈金倾家荡产了。他和他的四个儿子长年在渔霸家里当牛马,渔霸却一文工钱也不给。一次,欧陈金向刘家讨工钱,刘元谋还是一副铁青的凶相:“你算算看,一千元的利钱有多少?怕你们五个人的工钱还不够偿还利息呢!”

欧陈金向他恳求说:“我家五个人都在你这里白做工。家里吃不上饭啦!是不是可以留下三个在你这里,两个回去挣饭吃。”

渔霸说:“你欠我的债没有还清,谁敢收你儿子做工?沙埕港上哪个不晓得我家的厉害?”

“难道我四个儿子要给你家白做一辈子上?……”

渔霸狞笑两声:“我要你的儿子给我的儿子干活,你的孙子给我的孙子干活……”

老渔民欧陈金讲到这事的时候,说:“我想起渔霸,恨得全身都会发抖。我的四个儿子给渔霸当了十多年牛马;要不是解放了,恐怕我欧家世代子孙都要替刘家当牛马。”

十一 一条人命

即使你没有欠渔霸的债，但只要你是沙堤的渔民，都得提心吊胆过日子，说不定有什么横祸落到你的头上来。

在街上，经常见到刘家的狗腿子打人。刘家少爷和他的什么“八公子”“三少爷”，都是有名的色狼。他们经常在大街上调戏渔家姑娘；他们看中了谁家的姑娘，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拉到家里强奸。老渔民连风叹口气说：“刘家渔霸不是人，那是一群禽兽，禽兽！”

有一次，渔民李秋发家里没米下锅了。他跑到“刘荣太”那里讨工钱。谁知道，刘元谋的弟弟刘尾正在饮酒作乐。刘尾认为，李秋发这时来取工钱，有损刘家尊严，随手拿起板凳，把李秋发打得死去活来，还恶狠狠地说：“放屁也要看风势，拿工钱也不看时候，老子就不给你工钱，你全家饿死也不干我的事！”

在渔霸眼睛里，渔民的生命能值几个钱？1941年夏天，沙堤港里发生了一件使人难忘的惨案。

那是六月间。由渔工刘吓松掌舵的一艘小钓鱼船出海捕鱼，中途天气突然变化，他们只好驶着空船回来了。刘元谋知道了这件事，逼着渔船马上再出海。刘吓松恳求说：“看这天气，台风就要来了，这时候出海，只剩下三分命呀！”刘元谋毫不动心，他一面说：“刘家的渔船就不许空船回港！”一面叫儿子刘雪尉砍断锚绳，强迫渔工出海。那天夜里，天呼地号，海上刮着狂风，卷着巨浪，沙堤港上多少人家睡不着觉，流着眼



泪，惦念着出海的亲人。第二天台风越来越大了，那只小釣船终于翻在巨浪里，十一个漁工全部葬身海洋。

在这次惨案里，漁民刘发英一家死了三个人，他回想这件惨事說：“那几天，沙埕港上到处都是哭声。我哥哥、嫂嫂、姪儿惨死了，连尸首都找不回来。我們就到‘刘荣太’那儿要求赔偿。你猜漁霸怎么說？他說：‘人死了就算了，翻了我的船，不找你們算帳，就算好了！’十一条人命呀！漁霸的心动都不动，那心不是肉做的呀！”

几道鬼門关

在那苦难的日子里，漁民們受尽了屈辱。那时候漁霸称他們“曲蹄子”（即双腿弯曲的下賤人），不准他們住到陸上来，說什么“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見官”，“曲蹄爬上岸，岸上遭灾

殃”。就是在台风压境的时候,也不讓上岸避风。水上漁民办紅白喜事,也受到种种限制。哪一家漁民在陆上办喜事,漁霸的狗腿家丁,便涌到他家作座上“客”,大吃一頓以后,还要逼着送“喜錢”。不然,就大打出手,把喜事变成了丧事。而漁民举办丧事,漁霸又規定要在沿路挂紅結彩,否則就不准通行。老漁民江阿秀談起这些往事,脸沉下来了,他說:“那时候,我們漁民只能伏在小船上过日子。”

沙埕港上漁霸像吃人的虎鯊;而兵匪又像一群蝗虫。海上、陆上兵匪横行。那时候漁民駕小船出海捕魚回来,要过許多道“鬼門关”,处处遭勒索。有一次,由漁民連风掌舵的漁船,滿載了魚从漁場回来,在台山海面遇到海匪,劫走了一批魚;船駛到猪屎窟地方,又遇到国民党軍队,那些挂着青天白日帽徽的“武士”,就在青天白日下攔船搶魚。連风不肯,国民党軍队就持枪上船,抽起棍棒打伤了連风,夺走了一批魚。船駛进沙埕港,还没靠岸,一群区丁蜂涌而来,不由分說,又搶去一批魚。滿船的魚剩不到一半了,接着就是“刘荣太”一百六十斤当一百斤的大秤在等着他了。連风說到这里,发出一道积郁的怒气,他說:“那日子,我們漁民有句辛酸話:‘打不到大鯊要跳海,打到大鯊也要跳海’,真恨不得拿起鯊魚篙,打碎这黑暗世界。”漁家的歌謠这样說:

豺狼当道难活命,
漁家翻身等哪年?

漁民的苦难终于熬到了尽头。1949年,沙埕港解放了。

从此，沙埕港成了人民的漁港，当年橫行霸道的漁霸，有的被枪决了，有的关进了监牢，漁民們第一次当了這個美丽富饒的漁港的主人。

現在，沙埕港越发美丽富饒了。避风堤后面山上盖起了漁民新村，漁家从水上移到了陆地，組織人民公社，添置了机帆船，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生活也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苦难的二十八年

宁松勳

6月28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藏族姑娘兰尕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走在回家的道路上。

兰尕不見母亲，已經整整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漫长的二十八年，苦难的二十八年！母亲呀，您的脸上增添了多少条皺紋？您的身上挨过多少次皮鞭？您的眼角又流出过多少悲伤的泪水？二十八年，数不清的白天和黑夜，女儿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您啊。如今，过不了两个鐘头，女儿就要来到您的跟前，就要看到您了呀，怎么能不叫女儿高兴、激动！

二十八年以前……

接替父亲当奴隶

那时兰尕刚刚八岁。一天，忽然晴天一个霹靂，有人捎信說，給貴族江巴当朗生^①的父亲，被江巴打伤了，伤势十分重。母女急忙赶去探望，父亲已經不省人事了。父亲回家以后，就

^① 朗生，藏語，即奴隶。

臥病不起。过了几天，江巴派人来了，劈头就骂：“他媽的，挨頓打算什么，还不赶快起来給老爷干活去！”父亲全身瘫痪，躺在床上，只剩下一口气了，哪里还能起来呢？可是，米人不分青紅皂白，一陣皮鞭像驟雨般落了下去。父亲一声也沒有哼，母亲担心地走近一看，啊！他死了。母亲抱着女儿，守着父亲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这时，江巴大搖大摆地来了，他从鼻孔里挤出几个字：“哼，死了！”說完，用手向兰尕一指，走了。狗腿子会意，从母亲怀里搶拉兰尕。母亲哪里肯松手，兰尕也死劲拉住母亲不放。狗腿子发怒了，一脚踢在母亲的小肚子上，母亲立即昏倒在父亲的尸体旁边……

就这样，兰尕从八岁起，接替了父亲，在江巴家当世袭的农奴。每天，她早出晚归，給江巴放羊。吃的是粗豌豆面，早晨一小撮，中午两小撮，晚上一小撮。稍有不是，就不給吃的，还要遭到毒打。穿的是几片碎布胡乱縫綴起来的衣服，連身体也遮不住。晚上就在羊圈里和羊睡在一起。这哪里是人的生活啊！可是，幼小的兰尕不敢哭一声，如果被江巴看見了，少不得又是一頓木棒或皮鞭。只有在山坡上，在草地上放羊的时候，沒有人看見，兰尕才能痛哭一場。

三年过去了。一天晚上，当兰尕把羊群赶回来以后，忽然发现少了一只，怎么办？兰尕急忙回去找。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风呼呼刮着，野兽嚎叫着，找到半夜，也沒找到失去的羊，兰尕只好回来。江巴听說兰尕丢了羊，就狠狠地把她按在地上，用皮鞭猛抽，打得兰尕皮开肉綻，遍体鮮血。江巴說：“不中用的家伙，不如卖掉！”

像貨物一样被出賣

于是，像貨物一样，兰尕从江巴家里被賣到头人扎那家里来了，那时她才十一岁。到了头人家里，兰尕不再放羊了，专給扎那和他的老婆当佣人。这样，挨打挨罵的时候比过去多了。扎那的老婆，动不动就摔她的耳朵，罰她脫光衣服跪在石头上。幼小的兰尕，怎么經得起这样残酷的折磨，可是，眼泪只有往肚子里流啊。

好容易又熬过了五年，兰尕已經十六岁了。十六岁的兰尕，虽然由于生活的种种折磨，身体消瘦，面色发黄，长得却还



俊俏。老家伙扎那对她特别注意起来，有时对她淫蕩地笑，有时又利用她給他端这端那的机会，故意調戏她。兰尕已經懂事了，她非常厌恶这老家伙，时刻从心里戒备着，但还是躲避不了。一个大雪紛飞的夜里，兰尕正躺在寒冷潮湿的屋角里，想念着离別了八年的母亲。此刻，母亲也許刚从外面乞討回来；也許，母亲已經病了，正在破漏的小屋里呻吟；不，也許母亲已經睡着了，在梦里看見了自己的女儿……兰尕想着，想着。忽然，她覺得脸上触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啊，这是男人的手！她一惊，就使劲掙扎反抗。但是那个野兽沒有放过她，凌辱了这个无辜的少女。

北风在怒号，山林在嘶叫。十六岁的兰尕哭呀，哭呀，哭成了泪人。菩薩，你为什么不睜开眼睛看看？阿媽，你为什么要生出你的女儿？兰尕疯了一样，大叫一声，拚命地扑向漆黑的冬夜，向茫茫的雪地奔去。她想到死，但她又多么想能在死以前再看一看可怜的母亲啊！沒等兰尕跑到家，几个人拿着火把追来了，她立即被捆绑起来。

事情传到了扎那老婆的耳朵里，于是，不由分說，她把兰尕吊在房梁上，罵一句，抽一鞭……兰尕全身被打得沒有一块完整的肉，几次昏过去又醒来；醒来了又昏过去。扎那的老婆打够了，罵够了，才叫人把她从房梁上解下来。本来，扎那的老婆是想把她打死的，但是一想，兰尕还能值几两銀子，不如卖掉！

兰尕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又被卖到另一家貴族阿桑家里了。她带着未癒的創伤，带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像牛馬一样終

日給阿桑家挑水、种地、背东西。奴隶主对奴隶常用的手段：皮鞭、拳头、木棒，在这里也随时可以碰到。也許是胸中积聚起来的仇恨太多了吧，兰尕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世袭的农奴当了主人

岁月一年一年地过去。生活在新社会里的人，总嫌时间过得太快。而生活在地獄里的兰尕，却是度日如年啊。她恨不得很快就死，死了一切都不知道了，該有多好！可是一想起母亲，她又希望活下去。从别人嘴里，她知道母亲还活着。母亲呀，女儿实在想看到您！这里离家只有三十多里路啊。三十多里路，用兰尕勤劳的大脚走起来，阿桑家墙上挂的那架自鳴鐘，最多响三次就到了。可是，对于完全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隔墙如隔千重山，隔山如隔万里海啊！



熬呀，熬呀，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

1959年，兰尕听说共产党解放军来到了西藏，还听说他

們是專門為受苦的窮人辦事的，這使蘭尕心里燃起了一線希望：我蘭尕是窮人里面最窮的，是受苦人里面苦楚最多最深的，他們為什麼不到這里來呢？她暗地里祈禱：菩薩，請你保佑共產黨解放軍快點到這里來吧！

共產黨解放軍終於來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叛亂平息了，反動統治者垮台了。蘭尕看到工作組里有男的、有女的，可是他們都是平平等等、和和氣氣的，沒有一點架子。工作組里的同志還經常來找她，向她打聽阿桑是怎麼剝削和壓迫農奴的。起初，她不大懂得什麼叫“剝削”，什麼叫“壓迫”。工作組的同志笑了笑，對她解釋說：“剝削、壓迫就是說貴族頭人打你沒有，罵你沒有，你給他們種地，他給你吃了沒有？”一提到這，蘭尕的眼圈就紅了，慢慢地，她懂得了一些道理。

不久，錯高地區展開了控訴叛亂和封建農奴制度的群眾運動。工作組的同志启发她訴苦。蘭尕的苦還用得着启发？苦楚都在她的心里啊。在一次訴苦大會上，她吐出了積壓在心底二十八年的苦水。在場的群眾听了，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沒有一個不振臂高呼“打倒封建農奴制度，替蘭尕報仇”的。

緊接着，錯高地區要成立平叛生產委員會，在酝酿人選的時候，群眾都說蘭尕受苦最深，為人忠厚。在大會上進行表決的時候，每個人都舉起了自己的手，一致通過選她為平叛生產委員會的宣傳委員。

一個受了二十八年苦難的女奴隸，居然有這樣一天，不僅

摆脱了奴隶的命运，而且当了委员，为大家办事情，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六月的微风吹动着青稞，吹动着路旁的野花，野花和青稞一齐向兰尕点头微笑。林中的群鸟唧唧喳喳，在为我们的兰尕歌唱。兰尕，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欢乐地向前走着。



终于，兰尕和母亲拥抱在一起了，离别二十八年的母女幸福地重逢了。

母亲说：“兰尕，二十八年，你已经三十六岁了！”

女儿说：“阿妈，我清楚的记得，您今年是七十六岁了呀！”

兰尕，三十六岁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青春还刚刚开始！

阿妈，七十六岁也不算老呀，在新社会里，您会越活越年轻的！

一包痂疤的来历

于德江

我的家在河北省灤平县张百湾山前村。祖辈三代都给地主扛活。爷爷扛了一辈子活，最后却落了个饿死。家里没钱埋葬，奶奶求地主帮忙；地主不但不管，还把奶奶赶了出来，说什么“冲”了他家的福气。奶奶只得沿街磕头，乞讨了三捆秫秸，用柳条子编成箔，才把爷爷包起来入了土。

我父亲从八岁起，就给地主“二阎王”放羊。长大后，就给地主扛活。直到解放，整整当了四十年牛马。我父亲天天吃糠面饽饽，饿得常常头昏眼花。有一回，他从山上摔下来，脑袋受了伤，地主也不管。家里没钱看病，伤口化了脓，长了蛆，后来用桃树叶子泡的水洗，才保住了一条命。

在旧社会，我跟爷爷、父亲的命运一样，八岁就给地主“二阎王”放牛。放牛回来，还要干杂七杂八的活。一天，地主老婆叫我帮她烧火。她不小心，差一点叫柴火绊倒，却把气出在我身上，拿起红通通的通条就往我身上扎，把我的腿扎了个窟窿，到现在还留着伤疤。到了1947年，我再也忍受不了地主的苦和气，宁肯饿死也不干了。谁知地主“二阎王”暗中勾结



伪保长孙景亮，把我抓去当壮丁，替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

1947年旧历腊月二十七傍晚，我和两个同伴从山上打完柴往回走，迎面来了几个国民党匪军，他们像疯狗似地一拥而上，将我们五花大绑，架上汽车，拉到五六十里以外的地方，绑在破庙的大柱上。这天天气很冷，寒风刺得浑身直打哆嗦，我的手脚都麻木了。但神志还清楚，不禁想起了早晨在家的情景。早晨，妈妈向邻居借了几升米，对我说：“孩子，上山打些柴回来，咱好过个团圆年。”谁料到会遇到这班强盗。我咬咬牙，决心逃走。终于，我挣脱了绳索的捆绑，避过敌人的岗哨，逃出了虎口。在鸡叫时，我回到了家。这时，父母妻子已急得死去活来。按说，回来了就该过个团圆年吧，可是我知道敌人会来抓我的，不能呆在家里，只好含泪告别父母妻子，逃到姑姑家避难。

十天以后，我妻子生了孩子。国民党反动派没抓到我，就



使用了毒計。伪保长孙景亮带着匪軍把我家包围起来，逼着我父亲說：“交出儿子便罢，不交出就封你的門，全家滾蛋！”这时，地主“二閻王”假充好人，从中調停，叫我家拿出五石大米来，爷儿俩再給他扛一年活，可以保証“无事”。碰碎骨头也拿不出五石大米呀！放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

是去，要死死我一人；一条是不去，一家五六口人活活地冻死或餓死。我被迫走上了第一条路。就这样，我又被綁进了国民党軍队。

1948年3月底，我被补进匪三軍特务团。到那里后，每頓只給吃一个小孩拳头那么大的窝窝头。第一次操練，因为身体虛弱，操練半小时就昏倒了。匪軍穆班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他見我倒在地上，就用枪托打我，并把我的枪摔在地上，将枪的准星摔掉了。后来，排长、連长說是我摔坏了枪，又狠狠地打我，打断了三根扁担，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两三次。打了还不罢休，又把我拖到連部，逼我跪在玻璃磴上。刚跪上

去，两腿鲜血直流，我又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醒过来了。睁开眼一看，只见四面漆黑一团，四周死一样的寂静，地上湿漉漉的。我心里想，难道我死了嗎？难道我蹲在地獄里了嗎？……我慢慢地挣扎着站起来，两腿还没有站直，就碰到了頂。用手向四周摸，摸到了阴凉的泥土。啊！我没死，是蹲在地洞里。我屁股上、背上、大腿上都受了重伤，不能坐也不能躺，只好胸贴着地，趴在地上。一个绝望的念头涌上心头：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一定会死在这班强盗手里，再也见不到父母妻儿了……正在想的时候，只听得有人在喊：“德江！德江！”我一听声音，知道是同乡李庫。不一会，李庫抱了一条又破又薄的被子和一些枯草进来，给我铺了个地铺，就递给我半个窝窝头，气愤地说：“王八蛋班长，把分给你的一个窝窝头给抢去了半个。”我说：“只要我有口气，饶不了他！如果打仗的话，我就先把他干掉！”

从此以后，李庫每顿给我送来半个窝窝头，就这样苦熬着，一直熬了三个月，屁股上的伤渐渐好了，结了两块碗口大的痂疤。不几天，两块痂疤掉了下来。我看着这两块痂疤和从背上脱下来的半尺多大的皮，又恨又伤心地掉下了泪。我拾了块破布，将痂疤和皮包了起来。心里想：“这是血泪的见证，这是仇恨的见证，总有一天，我要报这血海深仇！”

三个多月后，我爬出了黑暗的地洞。我哪儿还像人，头发足有五六寸长，都结成了饼，生了虱子。地洞外，天气阴沉沉的，弟兄们正在背砖石，修碉堡。我刚蹒跚地走出洞口，又给反动班长看见了，他走到我跟前，恶狠狠地狞笑着说：“你还没

死：休养了这么多天，該干活去了，走，給老子背砖去！”

我这个风吹即倒的人，怎能背得动砖？可又没有办法，只得跟着他走。走到砖堆跟前，他命令我背六块大方砖（一块有三十多斤）。我的天哪！我哪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和他說了半天，他定要我背三块。我背起三块方砖，沒走几步就摔倒了。反动班长用日本刺刀对着我腿肚上就是一刀，我痛得在地上直打滾。心里想：我这一辈子白活了，只有寻死。我偷偷地預备了一颗子弹，当我把子弹推上了膛，将枪口对准自己胸口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現了父母、妻子、孩子的影子，我死了，他們怎么活？血海深仇誰給报？想到这些，我又把枪放了下来，决定逃出虎口，找八路軍去！心里想：給你們抓住了，就是你們的；抓不住，就是我的！誰知我这打算給匪連长看出来，立刻把我关了起来。一天早晨，連里抓回一个开小差的和我关在一起。我走上去一看，原来是李庫！他見我就偷偷地說：“德江哥，我活不成啦！給我报仇！”說着，他嚎啕大哭起来。这天上午，匪連长命令班长押着我和李庫，一人挖一个坑。我想，也許要把我倆枪毙了。真的，坑一挖好，就把我倆五花大綁。匪連长把全連士兵帶到坑前，然后叫我倆跪在坑边上，匪連长对大家大声說：“誰要想开小差，这就是下場！”說着，只听一声枪响，李庫磕到坑里。匪連长又把枪口对准我，左瞄右瞄，只听“崩”的一声，子弹在我头皮上擦过。匪連长打了一枪，就走上来，恶狠狠地踢了我一脚，罵道：“兔崽子，要想开小差，就跟他一样！”

这是什么軍隊！这是什么生活！就是死，我也不給你們卖命，我还是下决心开小差。1948年10月，我們从承德撤到

古北口；11月，又撤到北京，駐在东便門附近。这时，北京已經給解放軍包围了。我們的工作是拆民房，修碉堡。第一天去拆民房时，看見許多老百姓无家可归，哭声連天。見此情景，想起父母、妻儿的遭遇，我說什么也不去拆，我不能为劳苦大众干好事，决不昧着良心干缺德事。反动班长見我不动手拆，掄起皮带就猛抽，皮带上的鉄鉗子把我的头戳了两个窟窿。匪連长走来，狠狠地踢了我一脚，罵道：“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还不如一头猪，养头猪，还能吃口肉。”我心里想：“別逞凶，狗杂种，你們也长不了啦！”我头上鮮血直流，一位老大娘不顧反动派的攔阻，走过来，解下扎褲腿的布带，綁住了我的头。在修碉堡的时候，我发现东便門城墙底下有个洞，洞口用鉄絲网扎住，我打算从这洞逃走。过阳历年的时候，国民党匪軍的大官小官在除夕之夜大吃大喝。我趁他們大吃大喝的时候，偷偷地逃出兵营，走到东便門城墙底下，弄断洞口的鉄絲网，鑽出了洞。城墙上的敌人发现了，向我开枪，我理也不理，一直向北奔去……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太阳出来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元旦，碰到了一个人，他头戴羊皮帽、身穿黄軍装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他是解放軍。“可找到自己人了！可見到天日了！”那人瞧了瞧我，大声問：“干什么的？”我回答：“从国民党軍队逃出来的。”那人警惕地走到我跟前，在我身上摸了摸。我身上除了一个包痂疤和肉皮的小布包外，什么也沒有。我把小布包拿給他，他打开一看，惊奇地問：“这是什么？”

我把这两块痂疤和肉皮的来历向他說了，他听完，溫和地說：“好，跟我走吧。”他把我送到了补訓团，分配在三营。我們



班长姓刘，他一見我，分外亲热，端来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水，叫我洗脸洗脚，又端茶給我喝，还叫我換衣服。我感动得眼泪禁不住往外涌。我在国民党军队里苦熬了八九个月，連一口热湯热飯也沒吃到，每天的家常便飯是挨打受罵，現在剛到这里，班长就这样待我，还叫我同志，天下竟有这样好的军队！从此以后，我就在这里参加集训。过了一个月，我們开始訴苦。在一次訴苦会上，我傾倒积在心中的苦水，又拿出两块痂疤和肉皮給大家看。大家看了，都痛哭流涕，高喊：“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国！”

經過学习，我懂得了国民党军队是为剝削阶级卖命，人民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有一次指导员問我：“于德江同志，你願意回家还是願意在这里？”我坚决說：“我要参加解放军，决心消灭反动派！”

血 泪 深 仇

唐 海 清

1940年大年初一，是我出生的日子，也是我难忘的一天。在除夕那一天，因为家里欠了地主的租子，我的父亲躲租在外。地主见逼租不着，就狠心放火烧了我家的棲身窝棚，将我全家赶了出来。父亲听说家中起火，当夜就潜回村里，看见窝棚已成灰烬，悲愤地带着全家到一座破庙里安身。就在这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妈妈生下了我。为了全家活命，妈妈含着泪水，将一件穿了三代的破袄，给年幼的哥哥披在身上，让他迎着风雪去要饭。谁知道，就在我出生的这天，大雪掩埋了哥哥冻僵了的身体。父亲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离家去参加了抗联游击队。剩下母亲和我，后来在穷哥们的帮助下，靠母亲替人打短工，拣些野菜谷糠，半饥半饱地混着日子。在那些年月里，妈妈一端饭碗就叹息着说：“哪年哪月苦日子才能出头啊！”

1945年，日寇投降了，游击队也来到了我的家乡——马架子村。在一个深秋的傍晚，父亲回来了。他额间布满皱纹，眼睛闪亮闪亮，满脸胡楂，就像扎在肉里的钢丝。这真是喜出

望外，母亲拉着我看着父亲，兴奋得两眼流泪。

父亲一到家乡，就领着穷哥们斗地主吴老财，分田地，分浮财。穷哥们家家分得了衣服、细软、耕畜和各种农具，全村一片喜气洋洋。接着，父亲就被穷哥们选为村长。我家也从破庙里搬出来，住上了地主的两间北房。

1946年的大年初一，是翻身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庆贺翻身，到处贴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大标语。

就在这一天，区里的龔大叔来到我们家里，和我父亲讨论了老半天。当龔大叔走后，父亲欢乐的脸色，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母亲听说敌人要来反扑，就跟在他的身后问：“怎么办？”

父亲一瞪眼，眉尖翘起老高。接着，他一甩袖子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遍村响起锣声，男女老幼都拥到吴家大院门前。父亲站在高台阶上，放开他那洪钟般的嗓门，愤慨地说：“乡亲们！蒋介石想抢我们的胜利果实，派几十万大军来到沈阳。我们村的恶霸地主吴龙旭，组织了还乡团，引来了几千个‘遭殃军’，还勾结了胡子‘白眼眉’，一齐来‘剿’我们来了！”

父亲说到这里，乡亲们激愤起来了。

父亲继续镇静地高声说：“敌人不可怕，就怕我们不齐心。只要大家一个心眼，就有力量打击敌人。年轻力壮的都动员起来，拿起刀枪，上山去和敌人干。剩下的老老小小也要躲一下，避避风头。东西能藏的就藏，能埋的就埋，连水井也要封起来，不让敌人喝到一口水。”

散了会，妈妈领我跑回家去，急急忙忙收拾东西。我爬上

炕去，紧紧抱着刚分到的一件花棉袄，怎么也不肯撒手。

夜晚，北风呼呼地刮着，人们怀着愤怒的心情，冒着严寒，离开山村，缓缓东去。我扯着妈妈的后襟，杂在人群之中，一步一顿地走着。突然，前面响起枪声，山头上也点燃起大火。和敌人遭遇了。山沟里顿时沸腾起来，人喊马嘶，鸡啼羊叫，……这时，只听到父亲呼喊一声：“乡亲们，沉着些！撤！民兵，跟我上！快！”他一阵风似的朝前跑去了。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身影，却听得见他那沉重有力的脚步声。在他身后，有不少人拿着土枪、鸟銃，紧跟着他朝前跑去。

老人牵着牲口，妇女抱着小孩，一直向后撤。火光越来越远了。枪声越来越远了。

还乡团到底打进了马架子村。村子里立刻被糟蹋得变成了一片焦土，听不见鸡鸣犬吠，看不见牛马猪羊。只听见吴老财的大院里，不断地传出拷打群众的呼号声。

妈妈在山边用树枝搭了个窝棚，我们暂时住了下来。她到处去打听父亲的下落。可是毫无音信。

灯节那天早晨，我们刚喝完两碗菜汤，正蹒跚在柴草堆里避寒，一群匪徒闯进了家门，拉起我们母子，一直把我们推到吴家大院门前的广场上。广场四围，岗哨林立，机枪对着被抓来的一群老百姓，一片杀气腾腾。突然黑大门开了，走出一个身披黑色披风的蒋匪军官，和一个白眉毛、满脸横肉的大块头。这就是还乡团长吴龙旭和胡子首领“白眼眉”。吴龙旭摆出一副狰狞相说：“把那个穷村长带出来，让穷鬼们见识见识。”



“叮噹！”

鐵鐐响处，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門边。他，豎起两道剑眉，眼里滿含怒火，特别是那一臉連鬚胡槎，犹如根根鋼絲。威武不屈的精神，吓得蔣匪軍不敢正視一眼。

“爸爸！爸爸！”我連哭帶喊地扑上了台阶。

匪首吳龙旭眦着两排黃牙盯着我，說：“村长少爷，我沒請你就到了，真是賞光。”他右手一揮，正想給我一拳。突然，“叮噹”一声，父亲反剪着手，窜到了我和匪首的中間。

“欺負小孩算人？有种的朝我来！”

这时我才看清，我的父亲已經被蔣匪軍还乡团折磨得不像样子了：棉衣全被剝光，衬衣衬褲变成碎布片，紧貼在血肉模糊的身子上。猛地，有人将他往后一拖，“刷！”“刷！”皮鞭像

雨点似的落在他身上。他没眨眼，没皱眉，也没喊痛。

“胡子！”我又喊着冲上前去。匪徒们一脚把我踢下台阶。我爬起来，突然被妈妈拦腰抱起，冲上台阶。她用身子挡住敌人的皮鞭说：“打吧！他在这里，我在这里，孩子也在这里，一家人都在这里！……”她一脚将狗腿子踢开，抱着我，挽住父亲的臂膀，愤怒的眼睛死盯住匪首。

“不准打人！”“不准打人！”广场上传来乡亲们们的怒吼。父亲低头轻声地对妈妈说：“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带好孩子，记住报仇！”这时候，匪首吴龙旭见群众步步逼近，慌忙拔出手枪，对准父亲开了一枪。

父亲挺着身子摇晃几下，嘴里高喊出最后一句话：“共产党万岁！”

我的父亲被敌人杀害已经十六年了。我从来没有忘记国民党反动派欠下的这笔血债，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仇恨！我要向父亲学习，做人民的好战士。

（左文景整理）

美国强盗的一桩罪行

袁陆先

一年秋天，刚刚收了黄澄澄的谷子，大表姐就来接妈和我到她家去做客。舅父家住在小坡子村，我家住在思古湾村，相隔五里路。舅父和舅母正准备给大表姐办喜事。舅母拿出存了多年的花布，在堂屋里摆开裁缝案子，给表姐赶做嫁妆。那天早上，我妈看着在一旁绣花的大表姐说：“玉贞因长得真爱人，可惜我的陆先太小了，要不然，玉贞可是我家的人！”舅母说：“妹妹，哪个叫你年轻时东挑西拣的嫁迟了，如今又嫌陆先小啦！”说得大表姐不好意思了，她放下活拉着我和二表姐说：“走，我们逛街去。”

一路上我们高高兴兴的。可是刚走进城，就听见许多吓人的传说：“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兵来了！”“说是他们要在我们陆良修飞机场！”那年月，老百姓本来就怕兵，听说是洋兵来了当然更怕，逛街的人都慌慌张张，心神不定。我们正走在街上，忽然人们乱跑乱叫起来。有人大声吼着：“让开！让开！盟军的汽车开过来了！”人们赶快提起篮子，背起箩筐，有的往城外跑，有的往铺子里钻，狭窄的街上，顿时一片混乱。不一

会，几辆美国吉普车横冲直闯地开过来了。街小人多，老百姓躲也无处躲。第一辆车闯过去了，压烂了一个大媽的篮子，压死了一只母鸡。大媽哭着去挡汽车，誰知走来一个狗腿子把她推到一边，罵道：“老东西，你不要命啦！”几辆汽车連停都不停就开过去了。赶街的人看到这情形，慌忙溜回家去。

大表姐脸都吓白了，拉着我和二表姐就往回跑。她說：“往后再不来赶街了。”二表姐不平地說：“碾死鸡不赔，不講理！”

我們刚跑回小坡子村，一場大祸就降临了！

村里鑼敲得当当响，人們像救火似的从四面八方往村里跑。村头上聚集了許多人，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人声嚷成一片。打更老信，一面不停地敲着悶鑼，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喊：“小坡子村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哪！县政府的命令，盟軍要在这里修飞机场，限你們三天都搬走，三天后就要开机器来拆房子啦！”当！当！“小坡子村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哪……”当！当！这声音在炎热的空气中颤抖着。惊慌的呼喊，憤怒的咒罵和痛苦的叹息声交織在一起。打更老信的破毡帽压住眉梢，低垂着头，好像根本没有看見这样多的人似的，只是使劲地狠敲悶鑼，一遍又一遍机械地重复着那几句话。唉，这个老信也是小坡子村的人，而且是个孤老头子，如今，他住了几十年的小坡子村，仅有的一間破房子，眼看就要被人夺走，他的心情有多么沉重啊！

“盟軍，什么盟軍？”有人忿忿地問。

“就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兵！”

“什么盟軍，修飞机场还不是用来祸害中国人，是一群强盗！”

突然，“当”的一声，打更老倌把那张閻羅使劲摔在地上，痛哭起来：“小坡子村遭大难了，住了一辈子的老窝，祖宗的家业呀，从此都完啦！……”

我們回到家里，大表姐伏在裁縫案子上痛哭起来。舅父說：“哭什么！哭有什么用！”

这天晚上，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全村的人誰也沒有睡覺。老年人，成年人，小伙子，都聚攏在一起，整夜商量怎么对付这场灾难。全村人誰不焦心？三天，三天之后，这小坡子村就要变成一堆瓦砾，人們就要失去一切，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沒有。自己辛勤盖起的房子，汗水、眼泪浇出来的田园，怎能輕易被人夺去？舅父他們决定：一家也不能搬，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村庄，不能讓美国兵把它毀了。

第一天，全村死一般寂靜，人們在焦急、不安和憤怒中沉默着。

第二天，依然这样。

第三天，这最后一天，人們的心情更加紧张，更加激憤，等待着凶神們到来，誰也沒有离开自己的村庄。

果然，第四天一早，村外响起了轟轟的馬达声，大队美国兵和国民党保安队开来了。全村的人一齐赶到村外，青壮年站在前面，后面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里外几层人，挡住了进村的道路。保安队架起机枪，用刺刀对着人們的胸膛，逼着乡亲们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退到村口。这时候，万恶的乡长陪着

美国军官走来。乡长吼着：“怎么！你们敢造反！”美国军官把手一挥，隆隆的推土机直往村口冲来。

“来，你们打吧！”不知什么时候，打更老倌爬上他自己的房顶。他的房子就在村头上。只见他脱了上衣，站在房顶上，紧握着拳头，高声大骂：“狗狼养的，狗强盗，连我一齐推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呸”一声枪响，美国军官开枪打中了老倌。他在房顶上摇晃了几下，就倒栽下来。

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美国兵和国民党保安队，竟然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射击了。人们惊叫着，奔跑着，乱成一片。乡长带着喽罗开始抓人。美国的推土机朝一幢幢房子闯过去。

不到半天功夫，小坡子村的房屋全部被推倒了，只剩下一堆堆碎砖烂瓦。小坡子村被毁灭了！舅父、大表哥和十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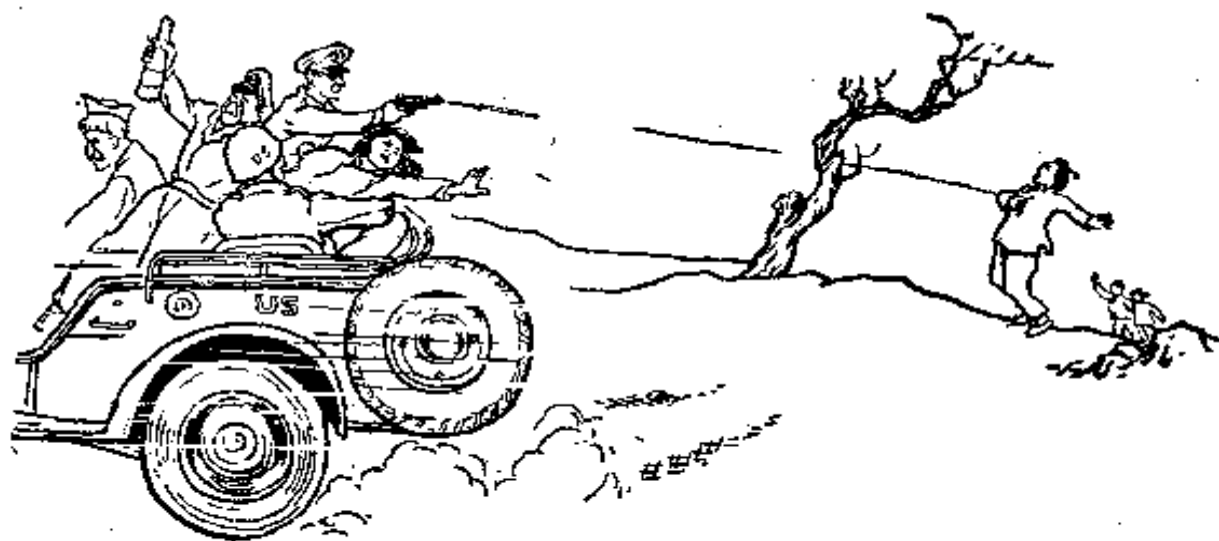
乡亲都被抓去了。强盗们用刺刀逼着我们立即离开村庄。

舅母带着大表姐和二表姐搬到我家来住。有许多没有地方去的人家，在南盘江边搭起低矮的草棚暂且安身。美国兵把小坡子村毁灭之后，又在它周围架起铁丝网，几里宽的地面都被他们霸占去修飞机场。每天，我们附近这些村庄，每家都得出人去修飞机场，哪家不去就罚款，罚工。我爹也被抓去做工去了，天天拉着大石滚碾地，晚上也不准回家。

时间一个月两个月地过去了，穷人受苦难受折磨没有尽头，爹累病了起不来床，又把妈抓去抵工。舅父和大表哥被抓去后，一点音信也没有。有人说是关在县城牢里，有人说是关在美国飞机场。舅母每天哭着去找，县城一趟，飞机场一趟，但是，哪里能找得着呢。后来，从飞机场逃回来的人说，那次抓去的人都被活埋在山上了。

舅母十分悲痛，但是她知道我家很穷，父亲又病在床上，就天天带着我和大表姐二表姐去开荒种地。一天，大表姐和二表姐正在开荒，突然大路上开来一辆美国吉普车，几个美国兵把大表姐抱上车开跑了，车后留下一股黄尘和大表姐的哭叫声。

舅母怎舍得自己的女儿呀！她每天带着我和二表姐到飞机场外去守着，想找到大表姐。一直守了半个多月。一天中午，我们正坐在大路边，忽然一辆吉普车从飞机场开出来，经过我们身旁的时候，忽然从车上伸出一双手来，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妈！”汽车一闪就过去了，卷起一股尘土。舅母在车后狂奔呼喊：“玉贞！玉贞！停一停呀！”我和二表姐也跟在她



身后跑，只見汽車上大表姐掙扎着伸出半截身子想跳出來，但是馬上被幾只美國兵的手抓住了。大表姐在掙扎着呼喊，汽車也顛簸起來。舅母伸着兩手拚命地沖上前去。突然，汽車上一聲槍響，舅母應聲倒在路邊。我和二表姐跑近一看，舅母胸口上中了一槍，鮮血流出來染紅了塵土，她還在掙扎呼喊：“玉貞！玉貞呀！”可是，美國吉普車早就跑得無蹤無影了。

舅母就這樣死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才十歲的二表姐，她成天坐在家里哭泣。

又過了十多天，一個黃昏，滿天的烏雲，風像哭泣似的在整個陸良塢子上哀號着，刮得黃沙直撲人臉。爹剛能起床又被逼着做工去了，媽天不黑就关了門，守着我和二表姐流淚。

“姑媽！姑媽！”我聽見門外好像有輕微的叫聲，不覺吃了一驚。再仔細听听，真的，一個非常輕微的聲音：“姑媽！姑媽！”

媽媽的手顫抖着打開了門。啊！是玉貞表姐，她，她手扶

着墙，垂头站在門边，我們連忙把她扶进来。她躺在床上，再也沒有一点力气了。

“姐姐，姐姐呀！”二表姐俯在她身上，一滴滴热泪滴落在她那蒼白得像紙一样的脸上。她微微睜开眼，伸出双手撫着二表姐的头說：“妹妹，快不要哭呀，你要好好活下去，要記住爸爸、媽媽，要記住姐姐的这些仇！”

媽媽端来一碗飯，递到大表姐手里：“囡，只要你回来了就好。快吃点吧！”大表姐双手不住地发抖，突然跪下抱着媽的腿說：“姑媽呀！环貞妹妹就拜托給你老人家了。我，我……”

就在这天晚上，当大家睡着以后，大表姐投入了滔滔不息的南盘江……

过去苦难的中国，有多少像我勤劳的舅父一样，像我慈祥的舅母一样，像我可爱的玉貞表姐一样的人，被禽兽般的美国强盗和反动派夺去了生命，这笔血債我們是一定要討还的。

（孙祖符整理）